

農委會研考專刊第一號

農復會工作演進原則之檢討

蔣夢麟 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編印

農委會研考專刊第一號

農復會工作演進原則之檢討

蔣夢麟 著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編印

農復會工作演進原則之檢討

目次

余序	· · · · ·	七
自序	· · · · ·	九
前言	· · · · ·	九
第一篇 農復會工作基本思想之演進	· · · · ·	一
第二篇 自由中國之土地改革	· · · · ·	一
第三篇 適應中國歷史政治及社會背景之農復會工作	· · · · ·	二七
第四篇 論美國世界性經濟援助方案	· · · · ·	四九
第五篇 土地問題與人口	· · · · ·	六九
附錄 台灣人口問題各報評論專輯（中英對照）	· · · · ·	一〇一

序

台灣光復後，政府致力於農村建設，增加糧食生產，充份供應軍精民食，維持低廉糧價，以配合勞力密集工業之發展。在以農業培養工業，以工業發展農業的策略下，創造了舉世讚譽的經濟奇蹟，而成功的農村復興工作是我們樂與友邦分享的台灣經驗中最重要的一部份，農復會在這方面居功厥偉。

民國三十七年十月農復會創立於南京，三十八年八月遷台，以迄於六十八年中美斷交後改組之三十年間，農復會秉持首任主任委員蔣夢麟（孟鄰）先生所確立四大工作原則，有效運用中美基金，協助政府推行土地改革、家庭計畫、改進農業生產、改善農村生活環境，成爲世界各國運用美援成功的典範。此四大原則包括：

1. 農村大多數人民之福利應首先考慮。
2. 計畫必須根據農民最迫切之需要而訂定。

3. 計畫應在主管機關輔導下，由人民自行推進，以鼓勵民衆參與地方建設。
4. 加強地方政府及輔導機關對當地農民之服務。

這種以協助人民自助解決其迫切需要，而非自上而下強制人民進行某項工作之精神，不但是民主方法之運用，同時也符合市場導向的農業發展原則。目前農業所遭遇的產銷失衡問題，有賴於輔導農民組設專業性的產銷組織，發揮自主性的產銷調節力量，才能有效克服季節性、循環性價格變動問題。在這些原則下，農復會協助政府推動了一系列的土地改革，解決當時最迫切的土地分配不均問題。四十年來由於整體經濟轉型之衝擊，農村勞力外移、高齡化，導致廢耕、粗放經營等農地無法有效利用，而家庭勞力充沛之專業農家卻無力購買農地，擴大其經營規模。經由七十七年第二次全國農業會議，七十八年國家建設研究會，大家已獲得共識，適度放寬農地取得之限制，將為實施農業企業化，提高農家所得最重要的政策手段，在最近期間內研究廢除耕者有其田，凍結耕地三七五減租條例，修訂農業發展條例與之配合。

本書「農復會工作演進原則之檢討」，為孟鄰先生於該會遷台初期所親撰，編

入該會叢刊第二種，現已絕版。本會以其內容珍貴，富有歷史價值，特予重新輯印，作爲本會研究發展叢書之一，俾廣流傳，並藉以紀念一代先賢對台灣農村復興的不朽貢獻。對於孟鄰先生於四十年前主張的台灣人口政策，當時中外傳播媒體，均有熱烈回響，爰將農復會於民國四十八年所印的「台灣人口問題各報評論專輯」，一併重印，作爲本書附編，藉窺全貌。

付梓前夕，謹書數言，以爲之序。

行政院農業委員會
主任委員 余玉賢 敬序

中華民國七十八年十一月

自序

作者撰述本冊各文之動機，原在使美方關係人士瞭解農復會之工作，討論美國世界性援助方案實施之途徑及促進今後美國對華經濟之合作，故原文除第五篇外，俱以英文寫作，茲爲進一步就教於國內賢達，故復以中文譯出，刊印成冊，希望由此獲得國內關心農村建設人士之指教，以求農復會工作之改進，並進而爲將來光復大陸後農村建設闢一途徑，是則作者殷切之希望。

原文第一至第四各篇，在美國關係方面，如經濟合作總署，國務部，國會及若干大學等方面，頗能引起一部份人士之注意，故對於美國世界性經濟援助方案之推進，不無影響。經濟合作總署並曾將原作印送亞洲各分署，用作各該地經援實施之

借鏡。爲使國內關心人士瞭解美方對今日臺灣農村建設之關切情形，故復將各方來函，擇其較有意義者，摘譯大意。作成附錄，以供參閱。

本冊各文所敘農復會工作，俱係較重要之原則與經驗，至其詳細實施情形，俱見農復會工作報告。

又本冊各文由李秘書循和抽暇逐譯，誌此以表謝忱。

中華民國四十年七月蔣夢麟

前 言

本冊集合短文五篇。因寫作時間不同，故若干論述，間有重複之處。將來如有需要，尚擬另文補充，因農復會工作常在演進也。

作者雖承乏農復會主任委員，但各篇所述有關農復會各項見解，並不代表整個農復會。

然作者仍深信各篇所敘，與農復會一般方針及其工作並無衝突，因所述各點俱根據實際工作經驗也。若干原定方針與計劃，因情勢變遷，不適用時，已隨時予以剔除，其由工作所得之若干新原則，亦已隨時予以補充及應用。

作者認爲一切原則與通例在未經試驗證明前，均祇能作爲一種假設，所謂真理原祇存在於相對之狀態中也。

論語有云：「子絕四，毋意，毋必，毋固，毋我」，是亦農復會工作之基本原則也。

民國四十年二月

第一篇 農復會工作基本思想之演進

——本會工作之基本原則以及基於此等原則而演進之方針

一 什麼是不應該做的

此一原則自另一國際合作機關之經驗得來，在本會開始計劃之前，即已詳加討論。該機關曾耗去大量金錢，其結果與其所使金錢相較，極堪懷疑。由此經驗，吾等瞭解何者不應爲。本會之計劃與工作異於其他機關者，即吾等開始瞭解何者不應爲也。

甲、不從事巨大建築。該等機關曾耗費大量金錢於建築，裝置最新設備等。吾等瞭解此等建築與設備不適合於中國農村，因標準太高，非中國農村所能維持也。

乙、不自行設立機構以與地方原有機關相競爭。本會僅尋求經辦機關推行本會所定計劃。換言之，即吾等扶助原有地方機構繼續存在，繼續生長，並不與之競爭，使之萎縮，而終至消滅。

試舉例言之。設有一血清製造所，其經費甚為困難，工作人員待遇亦極微薄。一般所採之辦法，為設立一新而規模完備之製造廠，以大量生產血清。本會所用之方法則為扶植此一原有機構，並瞭解其需要。如該機構值得扶植，則吾等選之為負責辦理本會計劃之機構。吾等予以補助，使之能繼續並改進其工作。吾等所選擇之經辦機構均為農村原有組織，農村原有事業之一部份。吾等注射新血液於該等原已貧弱之機體，使之恢復活力。因此，吾等之工作乃真能直透農村生活之核心者。

僅知何者不應為，尚祇是消極方面，然有時消極方面較積極方面尤為重要。蓋瞭解不應為時，即確定了應為範圍之一半。基於前述該一國際合作機關之試驗，吾等所獲經驗良多。

二 應該做的是什麼

甲、自地方及農民處瞭解彼等需要，而非教導彼等何者乃彼等所需要。因彼等所需，彼等自身瞭解最清楚也。由此一方針，故本會工作常在進步中，常從農民處獲得新的經驗。吾等不以先入之觀念推行工作，但虛心自農民處學習。此乃本會方針所以不斷進步之一重要因素。不問吾等之意向如何良好，計劃如何健全，倘不爲農民所需要，吾等無法勉強使之實行。

乙、進行增產工作應不忘社會公道原則，謹記公平分配一事。分配不公已在西方引起困難。西方國家自工業革命以來，財富日趨集中，此乃分配不公有以致之。或有人以爲「中國人民皆赤貧如丐，何從而言分配。奈何於僅有飯一碗之群丐中言公平分配，彼等遲早終將餓死」。然而不然。設一丐有飯一盂，而餘丐均無，則彼等將群起爭奪，然如將之平均分配於各丐，雖最後同歸於盡，仍爲彼等所樂爲。彼等將謂「同伴，此乃公道」。故當吾人推行生產工作之際，吾等應切記另一方面，即公平分配是也。

丙、尋求負責機關推行本會工作。如無適當經辦機關，則不如終止該項計劃。本會應行推進之工作甚多，但因無適當機構辦理，故並不立即一一舉辦。因無適當機構辦理即從頭設立一新機構以推行一項計劃，此固並非難事，然當本會補助一旦終止，該機構即無法繼續。例如農貸，乃吾人應辦之一項重要工作。試思農民所受高利貸之壓力，月息四分八，在一般情形下，已屬較低之利率。故農貸乃一極重要之農村問題，但迄今吾人對農貸尚未推行任何計劃，良以無適當辦理機關也。

前述何者應為與何者不應為之原則，迄今未嘗變更。然吾等之政策，則不斷因時因地而改進。

三 根據基本原則解決問題之方法

甲、由視察各省實際情形所獲經驗以改進政策，經常與地方領袖，實地耕作之農民等交換意見，由此瞭解彼等之需要與痛苦。

乙、比較各地需要，以發現各地之共同問題以及各該地區之特殊問題。本會循

此途徑瞭解糧食爲一全國性問題，並由此演進而得一全國性計劃。然此全國性計劃並非由吾人腦中原有觀念演繹而來，乃實地攷察各省情形後所得之結論。

在南京時期，吾人有增加主要都市近區糧食生產之計劃，並由此連帶及選種，灌溉，植物病害等問題之解決。此後，吾等赴四川攷察，地方人民告知吾等，四川最重要之工作爲築堤。築堤愈多，生產愈增。湖南，廣東情形與四川相同，北平附近則需要增加井數，皆爲充裕水源。因此，水利遂爲發展中國糧食生產之最重要工作。由良好之灌溉，農民始能增加糧食生產。

茲復舉畜病一例。在廣東吾人知農民深以畜病爲苦，四川亦然。實際，牛瘟，豬瘟以及其他畜病乃一全國性之問題。由與農民晤談間，吾人瞭解，防治畜病較改良畜種對農民更爲需要。中國原有畜種或較西方畜種爲小，然祇須不死，仍屬有用。故在農民眼中，使其牲畜免於死亡，乃最重要者。在廣西，吾人自善後救濟總署獲得一良好之經驗。該署曾輸入澳洲牛種，以後發現該批牛隻之胃力過弱，不能消化廣西之粗草，故羸瘦可憐，然本地牛隻生活良好。

吾人瞭解選擇牛種繁殖，需要各種飼料。此等飼料須自國外輸入或引進，同時

尚須教導農民種植方法。故依農民之需要，使牲畜免於疾病遠較繁育良種為重要。

丙、另一因素為時間。吾人必須謹記能在有限時間內獲得最大效果者方是最佳之方法。若干極具價值之計劃，因需時較長，未能予以補助。如農貸工作即需一極長時間，始能推行有效。吾人以一百萬美元之等值（地方自籌相等一百萬美元之數）在湖南從事灌溉工程之推進者，其部份理由在完工以後之第一期收穫，即可增加相當於一千二百萬美元之糧食。有如此巨大收穫之事業，世界殆無其匹。故當吾人在湖南之際，吾等深切瞭解，在有限時間內，灌溉工程應為首先推行之工作。因吾人在數月之內，即可保證農民之穀物生產增加也。僅洞庭湖復堤一項工程，即可減少全國糧食進口總數之三分之一。此項工程與本會最初所定增加都市近區糧食生產之原則全然符合，蓋湖南之米，可沿江而下，運濟華中華東各都市也。

丁、戰事刻變變化，必須採取最迅速而最有效之辦法推行本會工作。吾人不能停在一地，並在一地工作相當時期。當我等因戰事而撤離華中移至華南後，吾等在新的環境中，重又面對新的問題，新的需要。

在各地紛雜之各種不同之需要中，吾人仍可發現其共同點，由各種繁複之活動

中，吾人抽出其共同性，但未定一固執不變之原則而思普遍適用於全國。依地方需要，吾人由各項個別計劃演爲一全國性之計劃。此一計劃，依其重要性，當如下述：

- (一) 土地改革
- (二) 水利工程
- (三) 肥料
- (四) 農民組織
- (五) 農貸
- (六) 動植物病蟲害防治
- (七) 良種繁殖
- (八) 家畜飼育
- (九) 鄉村衛生
- (十) 社會教育

從上述可知土地改革爲最重要之工作，同時亦爲最難推行之工作。需費甚少，但負責執行當局須有堅強意志。其精神成果，在社會意義上，乃無可衡量者。

最易而又最能收效之工作爲水利。此項工作需要大量經費，但爲人人所歡迎，其物質收穫，在增加生產上，乃最大者。

土地改革與水利工作相輔進行，則同時具有精神與物質兩重收穫。土地改革與水利工作乃解決落後地區問題之兩把重要鑰匙。倘耕者均能有其地，而復有充份之

灌溉，則和平與繁榮之基礎已經奠定，憑此基礎，技術與農業科學始能發榮滋長。

農民組織倘能有效發展，將為推行一切農村改進及保護農民自身權益之有力機構，同時亦為民主政治堅強之基礎。

台灣農會過去甚有成就，惟自光復以後，農會與合作社分離，若干問題因以發生，故本會乃建議合併改組，俾能充份發揮效能。當時並擬在四川小規模組織農會，但以軍事情勢演變，未能實現。

上述綜合性方案乃指導本會全國性方案之一種類型，但如祇是一種類型，則不是動態的，進步的與客觀的。從實際經驗中不斷學習，不斷改進，乃本會之精神，原則，亦是本會之方法、同時並可普遍應用於遠東各地者也。

但在工作進程中，吾人無法發現此種類型，僅於事後逐漸發展而成。如土地改革，衡以美方報導，在最初本會似未嘗有何計劃。然而事實並不如此，土地改革非突然出現。當本人受命為本會委員之際；曾謁見總統並申述土地改革之需要，建議在南京附近選擇一區或一縣，作為土地改革之實驗地區。土地改革並非易事，實行之時，地方可能發生叛亂，甚或需要武力制止。故曾請示總統，為實行改革，需請

求武裝協助時，政府是否能支時本人，總統當時，即立予本人同意。此爲推行土地改革方案之最初種子。在委員會尙未成立，美籍委員尙未來華之前，各省均有代表來詢本會將如何服務人民。彼等請予援助，本人則請實行土地改革。彼等答覆，生產第一，土地改革其次。當吾等在四川考察之際，本人曾私語穆懿爾博士，如吾等先要求土地改革，將遭遇強烈反對。故決定先行討論生產問題，土地改革稍緩，待時機成熟再提。

故當福建龍巖代表來會請求協助推行該區土地改革計劃時，本會即派人前往實地考察該縣實施情形，並決定龍巖鄰近六縣亦同時推行土地改革。吾等作決定，因吾人由龍巖實施結果，瞭解土地改革，眞能改善佃農生活也。

推行積極性之改革恆須成熟之時機，故吾等必須逐步推進。在本會與湖南所定水利合約中，規定地租於復堤工程完竣後，不得較復堤前增加。在廣東吾等強調如需本會補助築堤，則地主必須實行「三七五」減租。最初發現土地改革之重要，請求本會協助者爲福建省主席劉建緒氏。推行全省土地改革之第一人爲台灣省主席陳誠氏，此後則四川，廣西，貴州先後繼起。上述乃本會土地改革方案之進展情形，

實係一種演進，而非一種固定而不變之類型。

吾等推行計劃，同時必須考慮其社會價值。利用科學增加生產易，解決社會問題難。如吾人推行增產計劃，而不同時實施土地改革，則增產成果爲地主所得者多，而佃農所得者少，此固大有背於本會宗旨者也。

民國三十八年十二月

第二篇 自由中國之土地改革

一 兩種改革方式——民主與極權

土地改革爲一極複雜之問題，而在遠東，土地改革又爲一最重要之問題。一國政治之趨向於民主或極權，端視其所用土地改革之方式而定。

以極權方式從事土地改革，其手段十分殘酷，採用暴力清算地主及富農，其最後目的爲土地國有與集體農場。

民主方式之土地改革，係根據公平之原則，逐步實行，其辦法尊重個人，合乎人道。改革之目的爲實現家庭式之農場，亦即杜魯門總統所稱：「吾人信任家庭農場爲吾國農業之基礎，並曾強烈影響吾人之政制」。

二 民主方式之土地改革——三項實施步驟

自由中國之土地改革採用民主方式，其步驟有三。第一步將農地地租減至全年總生產量百分之三七·五及保障佃權，並以之訂入租約。第二步為限制私有耕地面積，由法律規定地主所有耕地不得超過某種限度。第三步係將私有土地之超額部份土地，由法律規定公允價格，由佃農優先承購，於若干年內將地價償還地主。

第一步驟係一種佃制改革，其主要目的在解除貧苦佃農之經濟壓迫。此類佃農每戶之平均耕地面積，常在二英畝半左右，次要目的在減少地主從土地所獲得之地租利潤，促其將土地出售。第二及第三兩項步驟，可連續實施，其最後目的為實現「耕者有其田」，即家庭農場。

三 大陸各省之土地改革——三項步驟均經試驗

本會協助復興中國農村，其目的在促進大多數中國農民之利益。本會工作所循

途徑，爲發展一種以民主爲基礎之農村復興方案，使由實行所得之大部利益，歸諸農民享受。爲實現此一方針，本會主張任何農業建設之實施，必須以土地改革爲基本條件。在任何農村實施農業改良之前，必須實行某種程度之土地改革，俾由改進農業所產生之大部利益，得直接歸諸佃農，而不爲地主所剝奪。本會在大陸各省進行之農村復興工作，即以此爲基礎。本會在福建省第七行政督察專員區內，曾實施第三項土地改革，即扶植自耕農（註一）。在四川、廣西兩省曾實施第一項土地改革，即農地減租（廣西省之土地改革係減租與限田同時進行，但重心則在減租）。前列大陸各省之土地改革工作，雖因變亂之迅速延及而未能全部完成，但在極短期內初步推行成果仍甚顯著。由於此項成就，社會秩序趨於安定，並在國際間引起廣泛之注意。凡此種種，均應首先予以說明者。

四 臺灣之土地改革——第一步業已有效實施

民國三十八年陳辭修先生主政臺灣時，臺灣省在農復會之經濟與技術協助下，

實行第一步土地改革，即農地減租，此為陳氏推行進一步土地改革之準備。臺灣經此項土地改革，兼以政府努力增產，美國經合署之肥料供應及本會之技術與經費之協助等原因，於減租計劃推行後之六個月內，即顯見下列各項效果。即農業生產增加，農民收益加多，農村社會安定，經濟漸趨繁榮等，使本會在改善臺省多數農民經濟生活上所為之努力，大部獲得良好之收穫。

作者曾參與此項工作，深信農地減租計劃，為農復會與臺省府合作推行計劃中之最重要一項。作者並曾數度實地考查其實施狀況。茲將該計劃之概況分述如後。

五 減租辦法之立法根據

首先應予說明者為臺省減租計劃之實施辦法及其法律根據。中國過去之減租辦法，計有兩種，一為三七五減租，一為二五減租。此二項辦法，實係一物兩面。二五減租辦法根據民國十五年中國國民黨全國代表大會通過之議決案而由國民政府於民國十九年訂入土地法者。該法第一七七條規定：「農地地租不得超過正產物全年生產總量千分之三七五」。三七五減租之立法依據即在此。

民國三十八年四月十四日臺灣省政府公佈「臺灣省私有耕地租用辦法」，實施三七五減租。該辦法規定：「農地地租不得超過正產物全年收穫總量千分之三百七十五。其約定地租超過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應減為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不及千分之三百七十五者，從其約定」。

前項三七五減租原則係假定佃農所繳租額，係將其正產物總量與地主對平均分。依此對分原則，如將地主所得百分之五十之地租，減去百分之二十五，則其剩餘租金，即等於全年正產物總收穫量百分之三七·五。故此項辦法稱為三七五減租，亦即二五減租。

為保障佃權起見，實施減租時，並須登記及換訂租約。此一步驟極為重要。所有減租後之新租率及租期等，均須載入新約，俾業佃雙方共同遵守。此種租約登記及換訂工作為減租實施過程中最繁重之一部。

六 農民生活已獲得改善

就政治言，臺灣省之三七五減租，實為該省政治設施中最成功之一項設施。首

倡並實現該計劃之陳誠將軍已由於該計劃之實施而獲得臺灣人民之普遍支持。作者數次下鄉實地考察，曾目睹身受減租之種種利益。

減租後佃農能獲得利益若干，換言之，由於減租之結果，佃農之收入已增加若干。據地政研究所實地調查結果，民國三十八年減租後，佃農每耕種一甲水田，平均可增加相當於稻穀一、二〇〇臺斤之收入。此項新增之收益，如將其全部或一部份用於改善生活，顯有相當效果。如臺省減租前之農民大部均無充份米糧供家庭消費，必須向市場購買。減租以後，佃農家庭所需之米糧，已可自給。事實上，甚多佃農，除食用外，尚有餘糧出售，以購買其他生活必需品。佃農之衣著及居住，亦有顯著之改善。減租前衣衫襤褸之佃農，減租後，衣著已較整齊。減租前居屋湫隘之佃農，減租後，均紛紛建造較大之農舍。此種情形，於實地考察時到處可見。

減租成果之又一具體事例爲農業生產之增加。卅九年臺省米糧生產達一百四十萬噸。此項增產，半由於佃農有餘力購買及施用更多量之肥料以改良其土地之結果。蓋佃農除依土地等則繳付定額地租外，其餘增產之米糧，盡歸佃農自身所有，故樂於增產也。

七 減租後之種種問題

臺灣實施減租後之成效，已如前述。但若干問題亦隨之而發生。例如在減租過程中，土地等則，撤佃，退耕，水租及押租等問題，均紛紛發生。尤以等則及退耕兩問題最爲嚴重。

等則問題，於實施減租之初期即已發生。蓋地租租額決定於全年總收穫量，而土地之全年總收穫量，又爲土地等則所決定。土地等則不正確，則租額難期公允。在日治時代，日本政府規定土地等則每十年調整一次，以求與土地使用情形及生產力相一致。最近一次之調整係於民國三十二及三十三年間舉行，距今已達六七年之久，中間土地使用情形之變動，自在意中，故原定之土地等則，已不適合現在之使用情形，其中頗多較實際狀況爲高或低者。土地等則爲決定地租之標準，故等則較實際狀況爲高之土地，地租亦隨之較高，而不利於佃農。等則較實際狀況爲低之土地，地租亦隨之較低，而不利於地主。當作者實地考察農村時，經常有人提出調整土地等則之要求。

爲求地租規定之公允，土地等則之重行調整，極爲必要。如依日治時代十年一調整之辦法。非至民國四十一年不再舉行，此在時間上顯嫌過遲，不及應目前迫切之需要。事實上，臺灣省實施減租不久，吾人即感覺此項調整工作之需要。但欲求調整結果之正確與精密，則事功甚爲艱巨。惟不久臺省府即決定一地目等則調整辦法。卅九年六月，在農復會之技術及經費協助下開始辦理。

與等則調整同樣嚴重者爲撤佃與退耕問題。撤佃爲地主將土地停止租賃與佃農而將租約廢止之一種行爲。退耕則爲佃農自願取消其土地之租約，由地主將土地收回自行耕作或另租與其他佃農耕種。故在本質上，撤佃與退耕兩種行爲截然不同。但在事實上，佃農真正自願退耕者實甚少見。其要求退耕者無非受地主之威脅與利誘造成。所謂自願退耕或同意退耕者，實爲撤佃之變相。故實際撤佃與退耕並無區別。

減租後之又一問題爲小地主要求將土地收回自耕。臺省自減租後，若干中小地主因地租收入減少，乃援引土地法條文要求政府准許彼等將租出之耕地收回自耕。此項要求，大部均獲成功。在若干場合中，佃農雖拒絕地主之要求，但地主往往向

法院提出訴訟而獲得勝訴。此種矛盾之發生實由於行政與司法兩部門缺少聯繫，致司法機關未能於判決時援用法律作配合政策之決定，（此項辦法，以嚴格之法律觀念而論，自有種種困難）。事實上，提出收回土地自耕之此類地主，於收回土地後，甚少真正自耕者。彼等非另租與他人耕種，即雇工耕作。

欲解決此類法律原則與社會公道矛盾之問題，不外兩種辦法。一為司法機關於某種限度以內，以社會公道立場解釋法律，以適合政策之需要或由立法機關制定新法律，以順應社會需求。

鑒於此一問題之重要，行政院已向立法院提出一減租法案，現正在立法院討論中，不久可望通過，以加強減租工作之實施。（作者按：該項三七五減租法案，業於四十年五月二十五日由立法院通過，同年六月七日由總統公佈施行）。

八 地價跌落佃農開始購地

行政院為調查減租後所發生之種種問題及考查減租後一般農村經濟狀況，曾於

三十九年十二月間組織三七五減租考查團，分兩組深入全省農村考察。該團人員係由行政院、省政府、立法院、司法行政部及農復會等各機關代表組成，於四十年二月間考查完畢。

該團考察所得結論如次：

(一) 臺灣佃耕地地價，經兩年減租後，已跌落三分之一至二分之一，但自耕地地價則無變動。

(二) 佃農已開始從減租增加之收入中購買土地。據約略估計，全省佃農約有百分之二購買土地。根據四十年二月臺灣省地政局報告，全省佃農戶數中約有百分之二·七已自地主手中購進土地，在同時期內，地主間幾無購地交易。此百分之二佃農所買土地，約佔全省佃耕地面積百分之〇·七。

(三) 由於農民增加肥料施用及實施其他土地改良之結果，(註二)農地單位生產量已告增加，生產活動亦愈為開展。

(四) 佃農滿意之情緒，甚為明顯。(註三)

(五) 就學兒童顯著增加。在某一擁有一萬七千人口而百分之七十為佃農之鄉村，

當地小學校內就學兒童已由減租前之一千人於減租後增至一千五百人，計增加達百分之五十。減租前佃農須耕作四甲土地始有餘力送一兒童入學，現則耕作兩甲土地已足送一兒童入學。

(六) 該團於考察途中，曾解決若干法律糾紛。但如等則，水租，押租金及佃農購地貸款等問題之解決，尙待繼續研究。據該團表示，農復會如能予以協助，政府對於該團提出之建議，當可接受執行。

九 地主之困難

據與考查團同行考察之記者聲稱，減租後之臺省地主，似已陷入於進退兩難之境。減租以後，土地之增產，均歸佃農所有。同時土地價格則驟然下跌，更使地主蒙受不利。過去地主坐食地租逍遙享受之黃金時代，正在迅速消逝。因之，目前此等地主均願設法將其佃耕地出售，以期將售得之地價，投資於商業或其他小工業。地主之希望如此，但在佃農方面，彼等雖受減租之惠，但所得之積蓄，尙不足購買

其所耕之土地，同時又以借款利息過高，無力籌款買地。若干佃農會籌得款項購地者，於償還借款時，往往蹈入極大之窘境。故目前地主如將土地出售，甚少佃農能有力購買。但此等地主又不願繼續保有其土地，蓋土地投資，減租後獲利已甚小。

某一地主曾稱：「吾等以為將地租減至土地全年總生產量百分之三七·五，甚為合理。蓋此舉有助於臺灣秩序之安定。如無減租，臺灣或已發生社會不安，甚至發生騷動。予一家五口，有地五甲。減租前每年可收租米兩萬臺斤，現則已減至一萬三千五百臺斤。今日時代潮流，已在轉變，此後坐食地租，已不為時代所允許。故余已自積蓄中撥出一部款項交多之子女，改業從商」。此一地主，蓋已在另謀生計矣。

就大地主而言，減租並未十分影響彼等之生活。（註四）受減租影響至於進退兩難之程度者為中小地主。（註五）

十 地主之問題

臺灣省此次租佃改革，有兩大要點，一為將地租減至土地全年總生產量百分之三七·五，另一為將佃農之耕作權予以保障。改革之結果，土地所有權人雖仍能出售其土地之所有權，但土地之使用權由於租約關係仍屬於佃農，地主不能同時予以出售。此兩項改革使耕地地價驟然下降。另一報告稱由於減租結果，小地主最受影響。此類小地主之土地面積，普通為一甲至兩甲。全省小地主數估計約十萬戶（註六），佔全省地主總戶數百分之九。故此類小地主之出路問題，必須加以注意。所幸者，此種小地主，一般均有其他職業或收入以維持其生活。彼等勢須逐漸轉業以解決彼等之生計。一般意見均認為小地主所受減租之影響，僅屬暫時的，如假以時間，彼等將能自謀適應其經濟環境也。

十一 今後之出路

吾人欲求解決因減租而起之地主間之困難，主要在建設工業以吸引地主階級之土地資金進入工業生產途徑及建立一健全之農貸制度，俾農民能得較公允利率之資金以購買其所需之土地。問題至此，已引導吾人入於農業與工業交界之處，問題乃益趨複雜矣。

最健全之辦法，厥為將農工兩項生產聯繫於同一線上發展。應用現代之科學與技術，將農業之生產加工，運銷等業務連成一線，作為整個生產過程而促其連續發展。在另一方面，一切利用農產與原料之工業，應著重於農民生活必需品之生產。此為解決一國經濟發展過程中所遇「剪形問題」之最有效辦法。而此一「剪形問題」今日已在臺灣發生矣。

農復會在臺之種種試驗性計劃，對於中國大陸將來工業化方案將有明確之啓示與指引。過去大陸上工業與農業之脫節情形，將來應力加避免。

十二 不流血之革命

前節所提及之記者，對於此次臺灣土地改革，曾有下列之觀感，但其觀點或稍嫌樂觀。

「時代之輪，正朝向社會改革之大道加速前進。過去剝削農民血汗坐食地租之時代，正在消逝。不久之將來，吾人均須自食其力。臺灣農村不久將成爲自耕自食之樂園。一種不流血之和平革命，正在臺灣演出也。」

臺灣之土地改革，爲期不過兩年，但農村社會組織業已開始演變。此後如假以時日，吾人所推行之工作將愈多，從而產生之變革亦愈多。吾人如能將本省之經濟與軍事始終保持良好情形，則臺灣將成爲遠東方面實施社會改革極有意義之試驗區也。

（註一）民國三十八年五月，本會曾派員赴福建省第七區龍岩調查，發現該縣自耕農民，每戶可平均分得土地十五畝。境內農舍整潔，秩序安寧，乞丐盜賊均甚少見。在此種環境下，本會如實施任何計劃，其成果顯然將由農民享受。最近（民國四十年二月）據自龍岩來臺之某君稱，該縣自失陷後尙無「清算」等情事發生。

（註二）該報告稱全省共有五、八五九戶佃農購買土地，所購土地面積共爲二

、九八八甲。按臺省佃農總戶數爲二二五、六五六戶（三十八年統計），全省佃耕地面積爲六六、三二七·一〇甲（廿八年統計）。

（註三）據調查報告，臺省自減租後，佃農常表示一種憂慮，即一旦國民政府遷回大陸，本省地主可能強迫彼等重行依照減租前舊租額繳租，而將減租後所得利益全部償還地主。

（註四）據民國廿八年統計，全省擁有十甲至百甲之大地主約有八、一三三戶，擁有百甲以上之地主僅二七七戶。

（註五）據民國廿八年統計，擁有土地五甲至十甲之中地主約有一六、〇一一戶。

（註六）據民國廿八年統計，擁有土地一甲至二甲之小地主，全省共有七四、一五一一人。彼等均爲一戶之主，故實際即等於七四、一五一戶。此項數字係十年前編製，今日全省人口已增加百萬餘人，此項數字，當有若干變動。

民國四十年二月

第三篇 適應中國歷史政治及社會背景之 農復會工作

——此項工作能否適用於遠東其他地區

農復會之工作不僅爲若干增產計劃，予數百萬食不足之人民較多糧食。增產雖重要，然並非本會唯一之目標。增產而外，尙有土地改革，鄉村衛生，農貸，加工，運銷，地方自治等問題，以及調整商品對農產物之供應，俾解決正在發生之畸形問題等。

爲解決上述各問題，故農復會經常努力使其工作能適應中國歷史政治及社會諸方面之進展。

一 歷史政治及社會之背景

近五十年來，中國人民深受西方思想之影響。在其初期，中國人民所見之西方，係日本人眼中所見者。蓋當時西方思想，主要由日本轉輸而來。

(一) 民族主義之興起

甲午中日戰爭以後，民族主義，政治改革——其後演變為政治革命，成為中國思想上兩股領導主流。日本因採用西方文化而富強，中國何獨不能，此為當時一般人民之想法。因此，中國乃經由日本介紹入西方文化。但當時之所謂西方文化，其概念十分含糊。採用西方文化之目的在使中國富強，故一時西方文化被認為療治中國貧弱之一種萬應靈藥。

(二) 民主主義之興起

其時西方之民主思想業已進入中國。西方民主主義之自由主義與中國儒家之本主義及道家之自然主義頗有相同之點。因此基礎，西方自由主義之思想逐漸開始在中國發生力量。

(三) 思想自由與研究自由

第一次世界大戰以後，西方民主思想又邁進一步，此一進展，導使人民反抗牧

民政治，封建制度，殖民政策與帝國主義。

在此時期，思想自由之精神在學校，研究機關中蓬勃滋長，科學與民主成爲年輕一代最尊奉之口號。

思想自由運動，其後又分成兩道支流。其一引導入個人自由之研究，其另一則引導入社會改革之研究。

思想自由運動最初在政治上發展爲反抗殖民政治之憲政運動，在經濟上發展爲反抗帝國主義與殖民政策之企業自由與自由競爭。

(四) 社會主義思潮

研究自由在社會制度方面，其後演進爲國家統制之社會主義及計劃經濟，取法於蘇聯之經濟制度及政治組織。

此兩股思潮相互激蕩，有時合流，有時衝突。

在此種政治思想之衝擊下，注意中國前途之發展者，均未嘗不知社會革命即將來臨。但究將以何種形式出之，則無人敢預斷矣。

第一次世界大戰後之十五年間，中國完全處於前述西方兩種相反思想衝擊之下

。西方民主主義內容較爲複雜，在中國文盲遍地，普遍貧窮之情形下，人民了解民主主義之進程，自極緩慢而艱辛。因此，比較單純之階級鬥爭與無階級專政之理論，在左傾而年輕之知識份子間逐漸得勢。此輩現正統治赤色中國。

(五) 孫中山先生之社會革命

辛亥革命之前，中山先生即曾提出，除非社會革命與政治革命同時並進，則另一次激烈之社會革命無法避免。故嘗謂「吾等革命工作何必多來一次」。但多數中產階級未能擁護中山先生社會革命之主張。政治方面中山先生主張從訓政達到民主政治以替代牧民政治，經濟方面主張節制資本，以免中國將來工業化以後，再來一次社會革命。

國民黨政綱中耕者有其田之政策，其目的固不僅在改善農民生活，同時亦在避免一次農民革命。

中山先生之政治主張在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上有其淵源，故人民易於接受。經濟主張則因中國尚是一完全之農業國家，根本無資本可言，如何節制資本，人民全無

興趣。耕者有其田之口號一經提出，即受地主反對，即農地減租亦因反對而不獲實施。故其結果耕者有其田之政策，流爲空談，農地減租方案亦束之高閣。

當統治階級無視於此項演進之時，歷史巨輪已在悄悄前進。

(六) 中國蘇維埃化之背景

國民黨政治理論之有中國傳統政治哲學之淵源既如前述。共產黨之階級專政則在國民黨之政治理論中有其藍本。如共產黨之分配土地，即剽竊國民黨耕者有其田之政策。

國民黨之若干政策，如銀行，鐵路，石油，鋼鐵，鹽等之國有等，即已超過目前英國工黨政府推行之國營政策範圍。此等措施在人民心理上爲接受共產主義統治供給一消極順應之心理。

(七) 蘇聯之支持

除上述內在原因外，其外在原因則爲蘇聯之支持。蘇聯之支持中國共產黨爲其既定之政治政策。中國共產黨亦一貫遵奉莫斯科共產國際之一切指示，如軍事，青年組訓，政治組織，以及沒收與分配土地等。共產黨之能獲得貧農支持者，主要係

由於分配土地一政策。

軍事方面，共產黨係在蘇聯軍事控制下獲准進入東北，同時並獲得蘇聯掠獲之大量日本軍火之供應。實質上，東北係由蘇聯手中交與中國共產黨。國民政府與中共軍力之對比，因此逆轉。

(八) 歷史上政治地理之作用

此後，歷史上政治地理之作用開始發揮。即凡能控制東北省，即能控制華北；能控制華北省，即能控制華南。

吾人研究中國歷史，知北宋爲金所亡，南宋爲元所亡，金元皆來自北方。其後，清崛起於東北，遂以亡明。二次大戰期間，日本佔有東北，幾於席捲中國。

前述各節，其目的在使讀者對中國近代歷史之演進，能有一簡要之概念，而因以瞭解本會工作如何竭力適應人民之需求。

(九) 工作地區之選擇

農復會成立之初，正值中共在東北獲得軍事勝利之際。農復會預見當時軍事之可能之發展，故隨時密切注意一切軍事行動。

在思想衝突，經濟紊亂，社會不安，政治動盪，軍事失利諸種情形下，農復會開始推動工作。

因此，本會首先考慮者爲一般軍事情勢。鑒於華北受共黨侵襲之虞日甚一日，本會因限其工作於華中及華南。行有餘力，則推進於西北各省。

本會之工作開始於揚子江下流，然後再推至華中，四川諸省，再後，擴展至廣東、廣西、福建、臺灣諸省。吾等並赴西北青海甘肅等省考察，但除甘肅寧夏之若干鄉村工業外，其餘工作，均已不及推動。

當共軍逼近時，吾等自一省復一省撤退。一年之間（自卅七年十月至卅八年十一月）吾等自大陸完全撤退而轉移其全部工作於臺灣。

二 適應西方思想於中國狀況

中國自甲午中日戰爭以後，爲適應西方制度，業已歷盡艱辛，幾經挫敗，然前進之方向並未稍變。

農復會之工作，即在應用西方民主思想於中國實際狀況，其指導原則有下列各項：

1. 農村大多數人民之福利應首先考慮。
2. 計劃必須根據農民最迫切之需要。
3. 計劃應在輔導機關輔導下，由人民自行推進，以建設地方。
4. 加強地方政府及輔導機關對當地農民之服務。基本原則應為協助人民自助以解決其迫切之需要，而非自上而下強制人民進行某項工作。此乃民主方法之一種運用。

吾人發現自助一政策，在中國農村應用最為適宜。

歷來中國政府均建築於牧民政治之上，但中國土地廣大，人口衆多，為民牧者無法全力照料，因之道家之自然主義乃行之而無阻。中國農村，若干世紀以來，即生活於不干涉主義之自由空氣中，但同時最受忽視者亦為農村。故少許外來幫助，即能產生甚大效果。

農村社會因一向為政府所遺忘，故農民不能不自行努力解決其自身之問題。此

種自助精神係自長期艱苦及有限之農業設備中培育而來。故協助人民自助，即教導彼等利用較好及較有效之方法以協助自身。

彼等因不受注意，故必須自行認識其需要，並以其簡陋之方法自行解決其問題。

道家學說造成中國人民爲一極端之個人主義者，但儒家之倫理哲學——親仁睦鄰之道，則使之和睦相處。

農會及合作社即利用此種鄰里之誼組成，以溝通社會情感，並合力從事農村勞動。

農復會刻正針對臺灣現有農會及合作社從事一研究改進計劃，希望將來農會與合作社之組織能臻於健全，並能有效擔負其工作。

中國農民經長時期之文化陶冶，彼等雖爲文盲，但不能謂爲未教化。

中國每一鄉村即爲一地方自治單位，人民自行處理地方事務。彼等或甚貧苦，但多自立與自尊。

中國農民因經常受天然災害之侵襲，故均具有相當豐富之常識，彼等相信事實

，但不易接受空言。

三 實 施

將上述原則付諸實施，農復會之工作計劃因有下列二項主要目標，即一增產，二社會安全。

(一) 增 產

中國農民多數不願接受空洞之增產理論，除非彼等親眼見到作物生產數量確已增加。彼等最能瞭解之增產設施為水利。此一工作效果在農民眼中最為明顯，即水利愈溥，增產愈多。

另一彼等所能瞭解之事實為畜類與作物疾病之防治。一頭牛之死亡或一季作物之歉收，對於農民為一極大之災害。

使用肥料可以直接增加生產。在臺灣一噸肥料可以增產兩噸之穀。肥料一噸之價約等於穀一噸之價。故農民使用肥料一噸，即可多穫一噸之穀。大陸方面，除珠

江三角洲及其附近沿海地區農民已習慣使用化學肥料外，其餘各地，則尙未普遍。在大規模推廣應用化學肥料之前，必先辦理試驗與示範。

繁育作物及家畜良種亦爲增產之一法，但比較不易爲農民所瞭解。栽植良種作物，以較保守之估計而言，平均可增產自百分之五至百分之十。

推行鄉村衛生所以保持農民生產能力及解除農民之痛苦。此一工作效果對於農民十分明顯。但在大陸若干地區，推行之前，必須先加指導，因若干地區人民對西藥尙無十分信心也。一經指導並知其效果，彼等自樂於接受矣。

其餘有關生產計劃亦可以同樣方法推行。

其要點在如何經由各試驗地區推進至全省或全國，達到該計劃之全盤效果。如零星分散，而不顧及全盤計劃，則力量將因以浪費。故吾人推行一計劃，必先選擇若干據點，再連點成線，然後連線成面，以及於全省或全國。

介紹農民所未習知之新方法，在大規模推廣之前，必須先行辦理示範工作。

對於引進新的機械發明，事前應十分小心。農業工業化當然爲農村建設之最後階段，大規模生產亦僅能由應用機器獲得。但就目前中國農村情形而論，則大規模

機械化生產之時機尚未成熟。改進現有農業設備，或引進簡易之機器反較能適合目前之需要。在目前農村，除水利外，獸力較機器尤為歡迎。吾人不能強迫鄉村加速進步。此所以在勝利之初，因外援設立之若干大規模工廠（該等工廠曾耗費數百萬元於裝置最新設備及建築），終因生產之新式機器無法銷售而枯萎。

現階段中之農村建設工作，科學方法與技術乃農村所能接受而獲益者。

關於農村中貸款一問題之重要，本會亦已鑒及。現正詳密研究中，希望能為臺省樹立一良好而健全之農貸制度。農貸基金並非問題，問題在如何創立一健全之制度，能有效而良好運用此項基金。

（二） 社會安全

目前世界各國均同樣遭遇兩問題，一為國防安全；一為社會安全。國防安全不在本文討論範圍之內。社會安全或社會公道則最後決定吾等農村建設工作之成敗。

在工業化之國家，社會安全之癥結在勞資關係及生產與分配關係之調整。目前各國推行之社會福利政策即由此等關係之調整中發展而來，如美國之新政或公政，英國之工業國有等是。

在農業國家，社會安全之癥結在土地改革。馬列主義之所以在農業國家盛行，原因大半在土地。馬克思主義祇能在工業地區生長，而馬列主義則生長於土地。本會之所以全力支持農地減租方案之推行者，其故在此。

如前所述，共產黨由分配土地獲得貧農之擁護，其方法為清算地主與富農，沒收其土地，而將沒收之土地再分配於無地之農民。此正列甯在蘇聯革命初期所施行者。

本會深信農地減租為將來實施土地改革方案之良好開端。農地減租方案包含兩要點，一為減租，即將租額減低至年正產物百分之三七·五，一為保障佃權。次一步為限田，即地主僅能保有某一數量之田，餘田須售與其佃農。最後一階段為實行耕者有其田。

杜魯門總統於上年十月十七日舊金山之演詞中，曾謂：

「吾人瞭解亞洲有若干社會不平之問題待解決。亞洲人民希望耕者能有其田，並能享受其辛勤之果實，此正為吾國立國基本原則之一。吾人深信家庭式農場制，此為吾國農業之基本，影響吾國政治制度者至鉅」。

同年十二月二十日美國國務卿艾契生在其對聯合國大會演詞中曾謂：

「日本實施土地改革方案之結果，已使三百萬農民——日本農民總數之過半數，獲得土地」。

「此一事實表明基於合作與民主之基礎，由尊重個人尊嚴，個人自立與正常生活之和平步驟所可達到之結果，而非若干地區所稱「土地改革」所得之結果——將農民集體農場化，並完全置於政府管制之下，以政府代替地主」。

四 人 口

(一) 臺灣之人口問題

關於生產，雖有現代科學與技術之改良，然仍有其一定之限度。生產增加，人口亦趨向增加。如生產已屆限度，而人口不因自然原因或人為方法加以限制，則繼續增長結果，勢必將生活標準減低至無法生存。

以印度為例，據紐約時報 Robert Trumbull 之報告。

「印度，每年人口增加百分之一又四分之一，約爲五百萬人一年，而耕地面積則因生產力之喪失及缺水等原因而逐年減少，如印度之孟加地區」。

臺灣之農民總人口爲三、五七八、一七五人；五五三、三〇八戶。平均每一農戶約六口稍強。

臺灣之可耕地爲八三三、九一五甲，平均每戶耕作一、五甲，或三·七五英畝。爲維持一合理之生活水準每戶應有三甲或七·五英畝之耕地。

臺灣每年人口之增加率爲千分之三十（過去爲千分之二十四，但近年因醫藥進步，死亡率已減少千分之六）。依三十七年人口調查爲六、五〇〇、〇〇〇人。自大陸被侵佔後由大陸陸續移入臺灣之人口估計爲一百萬，（非農業人口）。以每戶所有耕地面積之狹小及可資墾殖土地之有限（不足六萬甲），臺灣之人口問題確屬嚴重。

農民由本會協助及政府或地方合作機關辦理所得之利益，如依上述人口增加狀況，勢必逐漸抵銷，終至一日，生產所得盡爲過度人口所消費。

依臺灣人口之增加率，則其人口（大陸移入人口不計）至民國四十四年時應爲

七、五〇二、〇〇〇人，四十九年時應爲八、六九七、〇〇〇人。至五十四年，如無自然或人爲限制，則依理論推斷，應增加爲一〇、〇八二、〇〇〇人。

對此問題，本會曾經予以研究。但認爲提供解決此一問題意見之時機，尙未成熟。

(二) 中國歷史上之治亂循環

一部中國歷史常在治亂循環中。造成此種一治一亂之主因，即農村人口問題。當農民因政治不修，天然災害，不能耕作其土地，而此項人數達相當數量時，則此失去生活依憑之農民即嘯聚而成流寇，到處竄擾。經過長期之戰爭，人口大量死亡。然後一新朝代自廢墟中出現，重新恢復和平。時間繼續前進，歷史不斷重演。在十八世紀以前，中國無人口過剩問題，因在該時期以前，中國人口向未超過六千六百萬。農民叛亂之主要原因爲政治腐敗與天然災害。但目前中國已有四億餘人口，而每人耕地面積僅有三畝，故農村問題因人口之過剩，益趨於複雜，由此所生困難似甚不易克服。

五 結 論

本會之工作在以簡易而可行之方法協助解決若干中國當前之主要問題。本會使用經費相當有限，在大陸各省所使用之經費爲三百餘萬美元之等值。在臺灣使用者，截至目前爲止，共爲二百餘萬美元之等值。一九五一會計年度（自卅九年七月起至四十六年六月）預算爲四百餘萬美元之等值。省政府方面對各該同一計劃所列之預算共爲八百萬美元之等值，地方縣市政府及鄉鎮人民所自籌之經費尚不在內。本年度本會所用之經費略較以往爲多，因吾等根據兩年經驗，知如何有效使用經費也。以喻比之，則本會供給酵母，政府與人民則供給發酵之麵粉。

吾人自近五十年來歷史與社會之進展，瞭解國人思想主流趨向民主。此所以本會在大陸以民主方法解決問題得以順利進行。目前中國大陸雖爲極權與專利所統治，但決不能改變此一民主潮流之進行。

至於臺灣，雖經日人五十年統治，然對於國人之生活並未發生多大影響。日治時代生活在臺之國人，一如生活於香港、澳門、鼓浪嶼、菲律賓、馬來亞、印尼，

越南、泰國、美國等地之國人。無論居住何地，生活何處，中國人始終爲中國人。且日本人與中國人之生活頗多共同之點，故其改變生活之影響更少，此所以根據在大陸時所定之原則與所得之經驗，能順利在臺推行，與在大陸實無二致。

日人在臺曾在各種建設方面進行若干工作，此等工作正本會所欲進行者。日人在臺推行之現代科學技術與組織，將本會之工作進程縮短甚多。現代技術與組織乃本會推行計劃之重要方法。

日人在臺之各種成就，可於下述數事見之。如現代化之公路網，農村之電氣化，義務教育之幾乎普及等，此除日本以外，在遠東其他地區所不易見到者。此外，則爲全省之安定與和平。

臺灣電力雖已十分普及，但並無工廠製造電氣用具，化學肥料在臺灣早已大量應用，然而無大規模之肥料製造廠。此爲一極饒意味之事實。理由何在，一言以蔽之，殖民政策是也。

由殖民政策產生之另一問題，目前本會所遭遇者，乃地方領袖人才之不敷分配。本省遣回日人之際，所有技術部門之日籍領袖及專家亦均遣送返國。多數中國人

均在日籍技術人員領導下協助工作，欲使之遞補日人所遺之缺，除若干人能勝任愉快外，其餘則尚須予以進一步之經驗。

基於上述理由，故本會正進行一專門人員訓練之計劃。第一期計劃將選送學生四十名赴美研究及實習，另一計劃則在本省就地予以研究機會。

六 本會工作能否適用於遠東其他地區

此一問題之答案，當視下列各項因素瞭解之程度。

(一) 該地歷史與社會進展之方向爲何？

(二) 該地人民共同之意願爲何，彼等所願慮者爲何？

紐約時報記者 Robert Trumbull 所發上年十月於印度拉卡諾舉行之太平洋學會消息，有下列報導。

「司丹福大學之 Robert North 於該會議上聆聽各亞洲民族（多數爲印度及巴基斯坦）代表攻擊美國政策與企圖以後，記述下列各點：

「如西方加以援助，則怕西方帝國主義侵入；如不加以援助，則被稱爲漠不關心」。

「如表示並無政治意味，則被稱爲維持現狀，協助反動；如扶持進步力量，則責爲干涉內政」。

「換言之，即無論吾人行動或不行動，總是挨罵」。

在中共得勢以前，中國人民對美國在大陸上之動機幸無此種誤解存在。歷來美援，均受歡迎。今日之臺灣亦然。

(三) 良好之政策與專家之意見，遠較經費爲重要，尤不宜在農村投入大量資金。其困難在推動工作之地方領袖與專家太少。開始必須借材美國，繼之應爲訓練設施，此乃一長期性之計劃。

(四) 探求人民目前迫切之需要，切勿以爲吾等較彼等所知爲多，其困難在使彼等瞭解將來之需要，此需一長時期之教育工作方能達到。

(五) 開始工作應先從小規模入手，除水利而外，萬勿應用美國之大規模辦法。美援應如酵母，專家與技術人員應如麵包師，政府與人民則供應所需發酵之充份

麵粉。用此方法，吾人方可使美國納稅人所負擔之一元美援獲得十元之收穫，此種社會公道，自助，自立與民主方法等之精神價值乃無可衡量者。

工作地區內之一切社會之不平，慎勿忽視。社會不平吾人前已述過，乃馬列主義之所從生。

上述乃本會工作之大要。作者曾旅行朝鮮、越南、緬甸、暹羅、印度等地，對各該地一般情形頗為瞭解。由所獲瞭解，故特提出上列各項，並益以下列一項。

增產與社會公道以外，應復益以民族主義一項——協助增強各該國家之獨立。

民國四十年二月

第四篇 論美國世界性經濟援助方案

杜魯門總統於一九四九年一月廿日在其就職演詞中宣佈，美國將從事一項合作計劃，以技術上之協助給與世界經濟落後地區，並謂此一計劃將為美國外交上四大支持之一，是即一般所簡稱之第四點計劃。其目的，在協助世界之自由區域人民，藉彼等自身之努力，生產更多之糧食，更多之衣服，更多之房屋材料，俾能由此促進世界和平，使所有人類達到「自由，尊嚴與富足之生活」。一九五〇年十一月杜魯門總任命洛基費爾(Nelson A. Rockefeller)為國際發展諮詢局主席，從事研究上項計劃之實施。該局經五月研究，於本年三月向杜魯門總統呈送一報告，內提出一援助世界經濟落後地區之具體方案，並建議以五億美元在各落後地區從事經濟建設（軍事援助在外），以抵禦共產主義。原報告節要載本年五月十三日紐約時報。本文係就農復會兩年餘來工作經驗對該方案所作之建議。

農復會在其二年八個月之艱苦工作進程中，獲得甚多之寶貴經驗，吾人相信此等由不斷試驗與改進所獲之原則與方法可以用於解決中國當前若干重要農村問題。但目前吾人正遭遇若干為吾人力所不及，或尙未見到，或在本會工作範圍以外之新問題。此如鄰居失火，倘不急起自救，則自己房舍之安全可虞，其最佳辦法，莫如協助鄰居共同消滅危險。

如各有關方面——政治，軍事，美援——各行其是並各自主張其重要性，則最後必共同走入口袋胡同，而進退維谷。

故吾人現今必須重行釐定吾人今後工作之方針，否則吾人之工作將真如該方案所指稱「具有價值」但「不夠完滿」之情形。最後則此「具有價值」之工作，亦將因鄰舍失火而變為灰燼。

本文原旨在對美國世界性援助方案作若干討論，但同時亦可作為本會工作與本省全盤經濟關係之檢討。

一 國防安全與社會安全

今日之世界正遭遇兩問題。其一爲國防安全，其二爲社會安全。此兩問題彼此關聯。進行其一，必牽涉其二。誠如該方案所指出：「吾等自由世界人民現正遭受兩重危脅，其一爲武力侵略，其一爲飢餓，貧窮，疾病與愚昧」。

(一) 社會安全

該方案特別著重於構成反極權侵略共同防衛基礎之社會安全。此爲一健全之政策，因國防安全不能建築於爲飢餓，貧窮，疾病愚昧所困之社會。此種社會本身蓋即爲社會革命之溫床，其結果必然招致侵略，此所以中國共產黨之武裝叛亂能在中國大陸造成惡果。

(二) 社會安全不能單獨抵禦侵略

以四川爲例。四川爲中國富庶省份之一，本會曾在該省進行若干農村建設工作，並協助省府推行一農地減租計劃。由此計劃受益之農民，計達一千七百五十萬人。據美國土地問題專家雷正琪氏報告該項減租方案之順利完成爲一「奇蹟」。在不

足六月之短短期間內，該方案全部推行完成，其成就實非始料所及。據一視察報告「一日夜之間，無數農民之精神與活力於久經桎梏下澎湃湧出」。

但四川終於未經抵抗落入共軍手中。當時未有騷動，亦無顯著之地下活動。實際因該省並無地方防禦，共產黨僅徒步而入。

臺灣如無百餘哩海峽之阻隔，美國第七艦隊之協防，則將經常處於入侵威脅之下。雖有政府與經合分署農復會合作之增產，水利，肥料分配，醫藥衛生及土地改革等計劃之推行，欲持久抵禦自大陸而來之大規模入侵，恐須遭遇重大困難。

(三) 社會安全爲防止變亂之有效武器

從另一面看，如不實施上述種種改革計劃，則臺灣極有可能爲共黨地下組織所顛覆。政府於一年之間，即曾破獲共黨第五縱隊四百餘人。據宣佈職業，此四百餘人中，約三百人爲農民。僅數星期前，政府尙破獲潛入山地工作之若干匪諜小組。此等地下組織之能發現，主要係由於人民之不與合作。某地主嘗稱：「本省之和平與秩序得以維持，首應歸功於減租計劃之實施，否則農村必致發生不安，甚至變亂」。

但此僅爲全部事實之一方面。倘無政府及經合分署之肥料，農復會之督導及水利設施之推廣等，僅憑農地減租一項，並不能獲得上述效果。實施減租，同時復輔以足夠肥料之供應，水利設施之推廣，使三十九年之稻米產量突破二十七年日治時代之最高產米紀錄。其餘如防治牛瘟，促進鄉村衛生，建設鄉鎮自來水系統等經合分署及農復會所協助推行之工作均有助於臺省之增產工作，並予農村人民以信心與希望。

本省軍糧民食全年需米一、二一五、八〇〇噸。民國三十九年米產總量，除前述消費數外，尚獲餘糧二〇四、二〇〇噸。民國四十年之米產總量估計可達一、五一〇、〇〇〇噸，如是則可有二九四、二〇〇噸之餘量。此將更形增強人民之信心與希望。

二 國防安全與社會安全之均衡

臺灣目前正遭遇一項困難，此爲目前民主國家所共同遭遇之問題，即社會安全

與國防安全之衝突。過於重視國防安全，則社會安全必多少受到忽視，反之亦然。戰後美國國內盡力於種種社會安全之措施，但未嘗及於國防安全。南韓之遭受侵略未始非由此而來。蘇聯在國內之設施，則一反美國之所為，致其全力於軍事措施。因此國內生產雖然增加，而人民仍不能提高其生活。

(一) 如何於國防安全下維持經濟之健全

目前臺灣之問題為在相當龐大之軍費下如何維持其經濟狀況之健全。縱有軍援，而利用此項軍援之費用亦非目前本省所能負擔。就理論與現實而言，則軍援之來，必須繼以適量之經援，方不至有違軍援之目的，影響社會安全。

國防安全與社會安全，其關係如是之切，已如前述。茲吾人進一步論另一問題，即生產與公平分配（社會公道）。

三 生 產

(一) 農復會推行生產應用原則方法及其所收效果

農復會在其推行社會安全計劃所採用並經試驗之若干重要原則與方法如下：

1. 瞭解農民迫切之需要，不必強迫彼等接受所未經準備接受之事物。農復會工作之所以能獲得農民之全力合作，因各該推行計劃真能解決彼等之需要。

2. 尋求適當之經辦機關以擔負本會所委託之任務，不必自行設立機構與地方原有事業競爭。地方機關及事業因此協助，遂獲得生長與發展。

3. 在增加生產過程中，應經常注意公平分配，由此途徑，增產所獲成果，始能如原報告指稱真正達於農民。故本會工作在平民一階層中充份具有公平之意義。

4. 在耕地面積狹小及勞力過剩之國家，應多應用科學技術增加生產，不必大規模應用機械及其設備。機械僅能在水利設施與墾荒工作中應用方能有利。在現階段中國，獸力及改良現有農業設備較之引進新式機械更爲重要。

5. 經常由專家以醫生探訪病人之精神赴各處實地視察。農民現已瞭解本會專家之指導及精神之鼓勵有時較之經費補助，尤形重要。彼等多能自動籌集大量款項以配合本會有限之補助，此在鄉村衛生工作方面尤爲顯著。彼等自行建築房舍並聘請醫生以配合贈與之藥品及聽取本會專家之意見。本會之政策爲本會供給酵母，人

民供給所欲製造麵包之麵粉。

6. 上項專家視察與督導，須從頭至尾澈底實施，並繼續不斷的予以注意和努力。如範圍較小或較單純的工作，尚不難辦到。但如範圍較廣，關係較複雜的工作，須長時間的繼續不斷加以努力。有關問題發生即須從速解決，不可拖延，不然必功敗垂成。「三七五」減租即其一例。台灣減租雖已實行三年，若非繼續督導，仍有變質可能。

7. 從一點或若干點開始。經過有效示範之後，然後再連點成線，連線成面。此如蜘蛛結網，先行定著數點，然後由點成線，由線成網。健全之計劃經過相當時間之推廣，自能產生良好效果。本會推行計劃之所以能在各地永久生長者因此。

8. 計劃之推行，必先考慮該計劃是否對一般生產發生相當影響，對於一般人福利是否有所貢獻，其零碎並與整個增產計劃不相適合者應從緩辦。

9. 建立制度以保持工作之經久。如繁育作物良種制度，吾人先由原種站開始，由原種站分配與改良種站繁殖，再由改良種站分配示範農家繁育推廣種，然後再將推廣種分配一般農家栽種。改良畜種亦以同樣辦法辦理。此說明吾等工作係由各

區中心推及全區。至鄉村衛生，則吾人先在各區分設衛生站，然後再在該區設立一衛生所，以聯絡各站。

10. 工作成就應歸功於經辦機關，此為獲得充份合作之途徑。與政府或其他國際機關辦理同性質之工作者密切合作，亦甚重要。本會經由此種合作精神業已充份獲得人民之信賴。

本會於開始推行新計劃之前，必經詳密考慮。經試驗或示範成功以後，則必以其全力推行此一計劃，使之充份實施。惟不可使本會整個方案因此而失其均衡。

基於上述理由，所以本會在福建臺灣實施減租成功以後，另以銀元四十萬枚飛運成都，動員十一萬四千人協助該省推行減租。為推行大規模生產，復以二百萬美元（地方人民亦自籌此數）在洞庭湖區辦理復堤工程。計劃完成後第一年收成估計即達二千八百萬美元。此工程雖未全部完工，但在施工區域人民心理上業已產生甚大效果。蓋當湖區各處受土共擾亂之際，惟獨施工區域始終安定，此因入民對於將來業已具有希望故也。此一工程最後終因共產黨之進入湖南，於使用九十萬美元工程款之後中斷。

四 生產與分配之均衡

上述二例，充份說明本會力求生產與分配平衡之努力——獲得社會安全之唯一途徑。

該方案關於「根除飢餓，貧窮，愚昧及疾病」之主張，即係本會正在推行之工作，不過本會之工作另多一項，根除社會不平耳。前述本會所依據之方針及其所使用之方法乃提供推行第四點方案者之一種參考。除文盲實際祇能用強迫教育掃除外，吾人在臺所作一切努力皆可作為第四點方案所需推行之工作。就臺灣與大陸教育普及程度一點相比，使本會充份瞭解，教育在樹立社會秩序上之價值。

臺灣具有若干優點，使本會工作（亦即第四點方案所擬推行之工作）得以有效推進。如（一）良好之交通，（二）電力普遍及於鄉村，（三）文盲極少，（四）良好之水利設施及（五）安全與秩序。

除五項安定與秩序為其餘四項之結果外，在任何落後地區，道路建築，電力設

施，水利工程等皆可從小規模開始進行。

(一) 文盲問題

用成人識字教育辦法消除文盲，無論辦法如何良好，終祇能作為一種臨時辦法。其進程十分艱辛，但其結果並不能如預期之永久。故作者建議以電化教育代替識字教育，其目的並不在減少文盲，而在應用圖畫，照片，影片，無線電等工具傳授實用知識。掃除文盲之唯一有效辦法為設立一普遍之公立學校制度。根據大陸四十年之經驗及在臺二年餘觀察之結果，吾人瞭解掃文盲並無捷徑。

吾人相信解決生產與分配等問題用圖畫，卡通，照片等方法直接說明，較之先經成人識字教育為簡捷而有效。

(二) 社會公道為社會安全重要因素

該方案曾提及土地改革，但略而未詳。此間所見僅係紐約時報所載節要，而未見全文，究不知原報告是否尚有有關土地改革部份未經節入。

吾人均瞭解土地改革為一棘手問題，該方案作者或已瞭解此點，故對土地改革乙點未能多加論列，其或恐引起若干落後地區合作國家政府之不安乎？生產為統治

與被統治階級所共同歡迎，但公平分配祇為被治階所歡迎。倘如政府無實行決心，則難望有何成就。但吾人必須瞭解，祇有生產與分配均衡之計劃其效果方能持久。美國納稅人是否願見第四點方案實施之結果，窮人所得者為骨，而富人所得者為肉乎？該方案曾指出，「此等基本工作，如衛生，教育，農業，欲求成功，則必須直接達到農民」。但如何方能直達人民乎？僅憑善意不能產生所希望之結果。

如何使社會安全與國防安全，生產與分配保持均衡，乃今日民主世界所共同面對之嚴重問題，非獨落後地區然也。

(三) 思想之瞭解與互信

欲求解決落後地區之問題，其最要者為實施者與受益者雙方思想之瞭解。前者必須如一良好之醫生，後者必須如願意合作之病人。醫生應同情病人，病人應聽從醫生勸告。如彼此缺少互信，則任何工作皆不能有效進行，無論本會經驗或其他任何經驗，皆屬無用。但單有互信，尚感不足，必須互相合作，然後方能共同思想，共同研究與共同行動。

其困難在引用一批願以其若干年光陰，在落後地區努力工作之合格人員，及自

各該地區遴選一批適當人員互相合作。此而解決，則良好之合作基礎業已奠定。

五 農業與工業之均衡

落後地區之多數人民均從事農業，故此等地區之工作必須自農業開始。農業逐漸發展，則工業問題，及農業產品與工業製品價格失調之「剪刀形問題」終須發生。雖然農業生產增加，但價格低落，受損者仍為農民。

茲試舉一例說明。農復會嘗就農業產品與工業產品價格作一比較研究，發現本年三月米價較上年三月米價增加僅百分之六，而同時期之棉布批發價格則增加達百分之二百五十，零售價格達百分之二百五十。此種失調乃今日臺灣所遭遇之一嚴重問題。

在另一方面，大陸上建設城市工業之經驗使吾等瞭解，如不注意鄉村農業，則農村凋弊之結果，城市工業亦無由生長。

日本治臺政策，在使臺灣成爲工業日本之穀倉，故以全力發展臺灣之農業。若

干工業，如電力，交通，水利，製造廠等，亦曾予以建設，但其目標仍爲農業，此等建設純爲發展農業樹立基礎。過去政府在大陸建設工業，與此完全相反，即純以發展工業爲目的，甚少顧及農業一方面。電力大部爲供應城市及其工業，鄉村並未受益。交通僅在連接城市，鄉村則偶然受益而已。政府以其全力發展礦業，然而爲農業發展所必需之修築築堤等工作之進行，則比較偶然，且總多少帶有若干救濟性質在內。

吾人必須瞭解，農業與工業實爲一連續的進程。吾等從事生產，生產需要灌溉及技術，繼以加工，運銷，出口等，則賴交通，電力及工廠，需要機器設備及工業技術。

六 平衡經濟

一地區之一切經濟問題必須作爲一個整體研究。農業生產，工業生產，外匯，進出口，稅則，政府支出，軍費等均互相關聯，其中任何一項必須視爲整個計劃中

之一部份，否則將遭遇不可克服之困難。

政府目前爲應防禦需要，故不能不在農民增加之生產中課征一部份，以充實軍備，然在臺灣農民已經感覺負擔沈重。

除上述外，農民尙有其他負擔，一爲高利貸款，一爲農業產品與工業產品價格之失調。

如祇知取蛋，而不知養雞，則雞即停止生蛋。所以吾人必須在生產與消費上力求均衡，以獲得一平衡發展之經濟。

此一問題，已在政府，經合分署及農復會各方面考慮中，其解決，必須由各關係方面聯合努力。各該機關頃正研究各有關主要問題並密切合作中，希望能由此商定一完整之計劃。但此爲一長期性之計劃，同時包含若干複雜因素。最重要兩項爲（一）複雜之人事關係，（二）複雜之經濟活動，需要精明及曾受訓練之人員來偵查與管制。此一計劃需相當時間方能具體化。

前論各節，雖問題牽涉甚廣，仍未能包括問題之全部。

七 民 主

最後之目標則在保障此一地區人民之民主生活。該方案曾謂：「吾人所稱之經濟發展，同時尚包含民主生活之訓練，俾人民均能參加公共事務，具有受司法裁判，工作，組織，罷工及選舉等權利，並進而謀取免於匱乏之自由」。

上節所述，旨在說明何爲民主及如何訓練人民行使民權。然對多數不熟悉英美民主制度之亞洲人民，並無多大興趣。

農復會在民主方面對人民所施之訓練，（一）在一般原則方面，則就生產與組織兩方面培育力求自助之精神；（二）在實施方面，則協助增強各級農會組織，自各村農事小組起以至省級農會皆實行自由選舉。

（一） 歷史的與政治的背景

此一地區大多數人民之需要誠甚簡單。彼等所需不過爲一良好之牧民政府，能協助彼等加多生產，減輕彼等之負擔而已。美國人民所行使之複雜之民主組織，尚非亞洲多數農村人民所感迫切需要。

民生之起源當追溯至一二一四年英國大憲章之簽定。自此以後，英皇權力大爲削減，尤以征稅權力爲然。此爲諸侯對皇室之一種叛變，與今日民主之含意相距尙遠。大憲章之重要作用，在將平民與貴族之權利義務分別明定，並予以保障。近代民主政治之發軔，蓋在於此。

亞洲今日反殖民主義運動之精神與英國當年貴族反抗皇權正相類似，皆爲被治階級反抗統治權力，而今日則爲被治階級勝利時代。

印度緬甸兩地人民民主之觀念係由英國殖民政府所引進，越南則爲法國之觀念，印尼爲荷蘭之觀念，菲律賓則爲美國之觀念。各該殖民地區所孕育發展之民主思想，原係殖民政府於無意中引入，然而今日已成爲反抗各殖民政府之武器矣。

(二) 應任民主種子自然生長

吾人目前所能做者厥爲聽任各地之民主種子，自行生長，此需一相當時期方能發展成熟。如認爲一切國家推行之民主皆須爲同一之類型，則爲一種錯誤。蓋一國民主制度之完成，必須適應一國之歷史，政治及其社會背景也。

(三) 信心與希望

中國民主立憲政府之發展，自其發動以迄共產黨佔據中國大陸時止，業已五十年於茲。雖中間幾經挫敗，然民主思想業已深植於改革前驅之知識階層心中。共產獨裁政權一旦推翻，民主思想必將繼續生長。人民今日所需者爲信心與希望——民主之信心與較好生活之希望。此對亞洲一切民族如此，非獨中國然也。

補論

(一) 私人投資

作者前於本文內未嘗涉及落後地區私人資本之投資。因在此世界局勢動盪之際，美國私人資本在不十分安全地區投資顧慮甚多故也。設係如此，則以小規模之私人資本在臺灣作一試驗是否可行。前已述及，臺灣農民現正受農業產品與商品價格失調之苦。如美國私人資本投資半數，其餘半數由地方人民公開投資，從事建設若干小規模之工業，則將有益於一般人民，尤以農民爲甚。臺灣人民對美國之管理與效率，深具信心，同時游資復可因以導入工業建設正軌。此在進行之前，當然尚須

經過一番詳細調查。

(二) 人口之增加

該方案充份瞭解人口問題之嚴重。故謂「：：多數落後地區均處於生產與人口之競賽中。一般情形，人口之增加總超過生產」。又稱：「多數地區人口生長之速率遠超過生產所能增加之程度」。

今日亞東人民普遍貧窮之主因為人口過多。貧窮又為其他罪惡之原因，民主與進化不能自飢餓中生長。但一旦免於飢餓，則人口生長速率又將大增，從而再造成飢餓。

中國自第一世紀（漢代）起，迄十八世紀初期（清雍正）止，人口在經常時期，恆保持五千萬人左右，此為一極富有趣味之事實。自十八世紀初期以後，中間每四十年，人口即增加一倍。迄十九世紀末（光緒年間），達三億七千七百萬。迄一九一八年（民七），中國人口為四億三千八百萬人。

(三) 蕃薯與中國人口

據典籍所載，蕃薯係於十六世紀（明萬曆年間）由馬來群島傳入中國。蕃薯、

王蜀黍，花生之傳入，種植方法之改良及國內工業品運銷海外交換糧食等，對於以後中國人口之增加影響甚大，而其中尤以蕃薯之影響爲最大。

但此新增之千百萬人口不僅需食，同時復需衣著，然原有織綢製麻之法過於費力，不足應廣大之需要。

棉之引進恰可解決此一衣的需要。棉種之進入中國係在十三世紀（元初），但當時棉花去子純用手工，彈棉則用彈工。其後軋棉機引入以後，棉之種植與應用方大量推廣，以適應人口增加之需要。

設如人口之增加無適當方法加以充份節制，則世界性援助方案其將重演中國蕃薯之歷史乎？

民國四十年五月

第五篇 土地問題與人口

一 土地兼併與民變

土地問題，爲吾國自漢朝迄今一個最感痛苦的問題。西漢土地兼併，形成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王莽知形勢嚴重，便想設法補救，於是收天下之田爲王田，希圖將土地重行分配。但積重難返，卒致天下大亂。地主之拚命反對自是意中事，佃農因並沒有即刻得到任何利益，好像畫餅充飢，自然不會擁護。適直青徐兩州（山東河南蘇北皖北一帶）發生嚴重的旱災和蝗禍，這真是切膚之痛，因此一觸即發，釀成大規模的民變。光武平赤眉，定天下。但經此一亂，人口大減。地主既遭摧毀，農民亦受大難。人口之減少，超過三千多萬人。承平以後，舊調重彈。土地兼併，一如往日，尋至黃巾亂起，天下三分。三國末葉，全國人口減至七百六十萬人。這是中國人口最少的一個時期（錢穆國史大綱）。

因土地兼併而造成一大群的貧農。黃巾之於東漢，猶赤眉之於西漢，都是農民的變亂，都是土地兼併的產物。大亂以後，國力削弱。雖經西晉的統一，而五胡乘虛，朝分南北。由兼併而招致民變，由民變而招致內亂，由內亂而招致外患，這種聯串的因果，可視爲中國歷史的通律。

北朝開始，即以解決土地問題爲重要的政策。當時人口既已大減，土地自有大量多餘。故北朝即以受田爲解決土地問題的方法。其主要點爲男夫十五歲以上受田四十畝耕種，另給四十畝休息。因爲當時耕種技術比較幼稚，故不得不按年輪植，以保持地力。婦人則減半受田。又土地與賦稅不能分離，故立租庸調三稅法。租是地稅，因人皆受田，故租按人而不按地。庸是爲國家服勞役，調是每戶出織物若干以貢獻政府。

(一) 受 田

隋朝統一南北，其受田方法，與北魏相似。男八十畝，女四十畝。若以半種植半休息而論，卻與北魏相同。

唐乘隋起，其受田制爲丁男中男給田一頃，以二十畝爲世業，餘爲口分。其稅

法亦採取北魏的租庸調。唐代制度，凡納稅人各圖其貌，以便稽查。與現在的身份證要貼上照片，同一意義。

唐代田制與稅制，其影響及於日本。日本當時朝野都儘量輸入中國文化，和明治時代輸入西洋文化一樣的澈底和熱誠。她在平安時期（七八一——一一八五）亦採取受田方法，和唐代相似，其稅法亦爲租庸調。（日本近代史第一章緒論，胡錫年譯）。

中唐以後，兼併又起。更以朝政腐敗，藩鎮作亂，使農民不能生活。黃巢乃應時而起，轉戰十年，靡爛全國，摧毀了文化燦爛統治中國三百年的唐朝。黃巢之於唐，猶黃巾之於東漢。此後復經五代之混戰，損失了三千多萬的人口。唐天寶時，有人口五千三百萬，到了宋開寶時，只剩了一千五百萬。

宋朝初興，沒有推行受田政策。此後歷元明清三朝都不再談受田了。宋王安石只談方田，防止漏賦，並沒有限田的意思。

受田政策之放棄，大概因爲墾地面積減少，分配困難。以墾地面積與人口比較，唐代平均每人可得二十七畝，宋代只可得十九畝，而明代且減到十四畝了。所

以明太祖洪武元年令州縣人民開墾荒田，不論有無原主，都歸墾荒人所有，作為永業。這是間接的按勞力而受田。

或者還有另一個原因，受田之後，經若干年人事的變遷，就漸漸的破壞了。兼併之風又起，如唐中葉以後的現象。當局的人們或者覺得徒勞而不能垂久遠，何必多此一舉呢。

(二) 人民逃亡之原因

富者田連阡陌，貧者無立錐之地。這兩句漢朝人的話，為中國一治一亂的大原因。元朝趙天麟說人民逃亡有五個原因：(一)天——天災流行，飢餓乏食。(二)官——官吏苛刻，賦稅繁重，富人納賄得免，貧人擔負獨多。(三)軍——軍費浩繁，民不堪命。(四)錢——借錢救急，重利盤剝。(五)愚——愚笨無知，謀生困難。請讀者瞑目一思，中國近幾十年來的農村狀況，有沒有與這五點相似？這幾句簡單的話是不是可為大亂原因寫照？

(三) 明末流寇

明末流寇之起，種因於晚明政治之黑暗。神宗的怠政聚斂，熹宗的昏憤荒淫。

內亂外患，相迫而來。兵戈不息，軍費浩繁。加派重徵，日甚一日。縉紳豪右從中漁利，在稅役方面包攬詭寄，設法逃避，把一切負擔都加在平民身上。（李文治「晚明民變」）

陝西省常常發生旱災。萬歷四十八年間，有災荒記載的佔二十五年。崇禎二年繼續旱災，陝北延安慶陽一帶，是災情慘重的中心。「炊人骨以爲薪，煮人肉以爲食」。張獻忠就是在延安北面的米脂發難的，李自成也生長於陝北，發難於甘肅。（同前）

李張二人率領了流民，橫行天下，靡爛全國，顛覆了明朝二百多年的基業。赤眉，黃巾、黃巢，李自成，張獻忠先後相隔一千四百多年。其起事之原因相同，其結果亦相同。其原因爲民變，其結果爲每次死了幾千萬的人。歷史上的教訓，兼併者被摧毀，被兼併者也被摧毀，玉石俱焚，同歸於盡。我們讀歷史，不可但看漢唐之燦爛文化，而忘卻了牛馬生活用血汗來生產的農民。一部燦爛文化史的背面是一部悲慘的血汗史，是中國文化的摧毀史。

（四） 人口加於土地之壓迫

我們但看中國有四萬萬五千萬的人口，而忘卻了從漢朝到清初中國人口從未超過六千六百萬（明永樂時）。在這一千六百多年的期間，在承平時，從漢至明，人口之平衡數為五千萬人。每人平均之墾地，漢代為十四畝，唐為廿七畝，元代為三十三畝，明代為十四畝。據光緒十三年統計只剩了兩畝半。最近據大陸方面來人說，廣東潮汕一帶土地分配，每人只分得了七分，浙江嵊縣每人只分得了一畝一分。我們從人口與土地關係看來，這是何等嚴重的問題。在大陸上不論何人當政，這問題終是一個致命傷。（歷代人口估計，大部份採自金兆豐中國通史。墾地估計大部份採自劉大鈞中國農田統計，為章柏雨等中國農佃問題所引）。

我們談到這裡就要想到一個問題。中國在清代以前一千六百多年間，人口平衡數為五千萬。何以到了乾隆六年就會增至一億四千三百萬呢？

據明史所載，天啓元年人口為五千一百萬人。經崇禎年間李自成張獻忠殺戮後，人口損失了多少，史無記載。若我們假定以雍正二年所記載的二千五百萬人為明末人口之數，則明末之內亂可假定損失人口為二千五百萬人。明末至乾隆六年，為時計九十七年。若以二千五百萬人為基數，又假定每四十年增一倍，則第一個四十

年爲五千萬，第二個四十年爲一億。第三個四十年爲二億。乾隆六年東華錄記載編審天下戶口畢，共大小男婦數一億四千三百萬人（見蕭一山清代史）。乾隆五十年人口爲二億八千八百萬。適爲第三個四十年以後，若假定三千萬爲明末人口基數，則第四個四十年當爲二億四千萬，與乾隆五十年之計算相近了。中國人口之編審，其正確性本是一個問題，充其極不過大旨而已，有時離大旨或亦相遠。但除此以外，別無依據。若說估計與假定，其價值亦不過等於估計與假定而已。

二 清代人口何以激增

除光啓在農政全書裡說：「生人之率，大抵三十年而加一倍，自非大兵革，則不得減。」明代在在徐光啓時，人口爲五千二百萬，耕地爲七億四千萬畝，每人平均得十四畝四，故其人口生長率之估計是對的。在歷史上看來，中國人口之大減，均在大亂後，故其理論亦是對的。徐氏去世不久，即是明末流寇之大兵革，十餘年間，人口死去一半，是徐氏知之而不及親見者。清代人口果四十年而加一倍，是又

徐氏推論所及而不及親見者。

乾隆時代的人口統計，其數似屬驚人，但以各種原因推測之，似頗近乎事實。而丁稅併入田賦，使匿報者少，也是人口數忽然增加的理由之一。

人口之增加，（一）需要耕地。（二）增加產量。（三）比較清明的政治。（四）相當的治安。其（三）與（四）兩點爲漢唐宋明清五朝盛時所共有，何以清代以前，人口終以五千萬爲平衡數呢？若以耕地而論，清光緒時代的墾地，超過洪武時代不過一億畝，何以能容人口比洪武時代超過六倍以上呢？（洪武十四年，人口六千萬，墾地八億畝。光緒十三年，人口三億八千萬，墾地九億畝。）我們分析理由如左：

（一） 農業技術之進步

東晉時江南種植法爲火耕水耨，何以叫做火耕呢？即用火燒去田草。何以叫做水耨呢？田草燒去後灌水種稻。草稻並生，去草留稻，再灌以水，草死稻長。這種耕法，產量自然薄弱，且一年祇能一作。到南宋時，據史傳所載，浙人治田，深耕熟犁，土細如麵，插秧緊密，上田收五六石。諺謂：「蘇湖熟，天下足」。這與浙

江現時種植法幾乎相同了。又謂江東人（楊子江下游）治田耕地不熟，地力不盡，稂莠雜生，不耨不耘。土地雖然膏腴，收穫常得中平。又謂廣西人不知移秧，不加肥料，又不耘耨。

乾隆初年上諭總理事務王大臣說：「至北五省之民，於耕耘之術，更爲疏略，是以一穀不登，即資賑濟，其應如何勸戒百姓，或延訪南人之習農者以教導之：即會同九卿，詳悉定議以聞」。〔宋希庠中國歷代勸農考〕

這是乾隆帝把江南農業技術推廣於北方的政策。

（二）甘薯之輸入與推廣

甘薯（或稱蕃薯）有人於萬曆間從南洋輸入其種。海外人禁不令出境，此人取薯籐絞入汲水繩中，遂得渡海，因此分種移植，略遍閩廣之境。（徐光啓農政全書）

甘薯所在，居人便足半年之糧，民間漸次廣種，凡有隙地，悉可種薯，即市井湫隘，但有數尺地，仰天見日者，便可種得石許。至於蝗蝻爲害，草木無遺。惟有薯根在地，蝗去之後，又復茲生。故農人之家，不可一歲不種，此實雜植中第一品

，亦救荒之第一義也。（同前）

故甘薯於晚明已逐漸推廣於閩廣間。乾隆四十年陳宏謀主陝政，以勸種甘薯爲六大農政之一。可知甘薯已推廣至北方邊省了。（宋希庠中國歷代勸農考）。又據中農所民國二十年至廿六年統計，全國甘薯每年平均產量爲一千八百萬公噸（米爲四千五百萬公噸）。此想係大量生產者爲根據，他若隙地之少量種植作一家糧食之用者，恐無法統計，其數想甚鉅也。故甘薯之輸入及推廣，可稱清代人口大增之重要原因。

若以臺灣而論。去年產米一百四十萬公噸，而甘薯之生產，達二百二十萬公噸，乾隆之際，其比率或較此爲更高。因當時人口日增，惟甘薯足以濟其窮，且遇荒年，更可以救急而不致於餓死。

甘薯與人口滋長的關係，證諸歐洲，也是如此。不過爲洋薯（*Latin Potato*）而非甘薯。據說德國工業化以前，人口之滋長就是靠洋薯的。據比利時人估計，如該國四週受包圍，只要廣植洋薯，就不會餓死。

蕃薯於江戶時代之享保年間（一七一六—一七三五，清康熙末葉），自中國經

琉球傳入日本薩摩地方。當時幕府爲增收重稅，亟思開源增產，因令各地栽培蕃薯爲增產方法之一。謂其生性水旱無妨，能在饑饉之年，代替食用。提倡人青木昆陽因此獲得「蕃薯先生」之別號。（胡錫年譯栗田元次日本近代史）

但日本雖遍殖蕃薯，人口未見增長。享保七年（一七二三、雍正元年）統計人口二千六百餘萬（十五歲以下及服役武家者不在內），至弘化三年（一八四六，道光二十六年）爲時一百二十餘年，而人口不過二千六百九十萬餘。每年約增千分之〇·二五，而中國則於此時期自數千萬增至四萬萬。蓋清代此時正爲黃金時代，而日本則政治不良，民變迭起，天災流行，哀鴻遍野，農民盛行墮胎與殺害嬰孩。且多山之島國，土地不易拓展。故蕃薯推廣之效果，盡爲禍亂天災殺嬰土地四者所抵銷，不能於人口生長起絲毫作用。日本人口之滋長至八千萬人爲工業化以後之事。

（三） 棉花之推廣

有食必有衣，絲麻不足應人口激增之需要。棉子於元初輸入中國，惟須以指取子，費工太大。後軋花機發明（或輸入），植棉之面積推廣，方能適應人民之需要。嘉慶元年諭廣植木棉，二十三年甘肅高臺縣知縣周璣，竭力獎勵人民植棉，並教

人民從吐嚙番來人學彈花之法，又使四川人教人民織布，並仿製紡車百二十架。織錠百二十枚，使人民學紡。（宋希庠中國歷代勸農考）

棉花之生產，浙江之餘姚，在明代已聞名於全國，其種係由海道輸入。西北之棉產，其種係由陸路從吐嚙蕃輸入。清代東西兩面推廣棉花，以應數萬萬人民之需要。日本非棉產國，不能大量生產棉花，亦為人口限制原因之一。

中國文化自東晉以後，逐漸南移，而瞻養文化之資料，當然要靠農產，故南方農業技術隨時代而改良。到南宋時，種植方法在浙江之發展，已為全國冠。乾隆帝竭力提倡推廣南方農業技術於北地，以期增加生產，解救人口滋長之壓迫。

生產與人口之滋長，常互相競爭。生產增加，人口必隨之增長。人口增長，人民必設法增加生產以解饑餓之壓迫。人口愈增，則每人平均之耕地面積愈縮小。耕地愈小則人口之壓迫愈甚，使多數人民常在饑餓線上過生活。中國近百年來之民生凋弊，國力衰弱，其總因在乎此，韓戰中之人海戰術之可能，亦在乎此，但是人海戰術終不能與機械精良，火力猛烈之現代軍隊相久持。常在飢餓線上之民衆，亦不能與工業化國家在生產上競爭。

據民國七年之統計，人口爲四億三千八百萬，墾地爲十二億畝，比唐代少兩億畝，而人口則比唐代盛時增九倍（唐天寶時人口爲五千二百萬）。唐代文化向上發展，現代中國文化成膠著狀態，其根本原因在乎此。若我們永遠膠著在甘薯文化之中：任何主義都無法找得出路。

三 節制生育

臺灣人口年增百分之三，若以本島人口六百五十萬爲基礎，則十五年後當增至一千萬，二十四年後當增至一千三百萬，即爲現有本島人口數之一倍。如此則現在平均每戶一甲半之耕地於廿四年後將減至七分半（合十一畝二分五）。比較福建龍岩縣之每戶十五畝還要減少三畝七分五，彼時臺灣農民生活程度必將降低一倍，無論如何增加生產，如耕地面積不夠，生活程度必然降落。

若現在我們多所避諱，不敢談生育節制問題，將來必蹈大陸上耕地不足之覆轍。

印度首相尼赫魯，於本年七月十三日在國大黨演說，極力主張以科學方法節制生育。又據本年七月十五日紐約時報記載，印度人口三億五千五百萬人，每年增加五百萬人，七十五年後，印度人口將增加一倍，（每年增加百分之十四）。故由尼氏主席之國家計劃委員會已提出一「五年經濟改進計劃」，內包含一節育計劃。該計劃將在全國各地普設節育中心以實施節育。然因甘地曾反對節育，故各方反對頗為強烈。但人口專家認為印度如不實行節育，則人民生活水準將江河日下，所有資源將盡為增加之人口消耗。

日本上議員加籐夫人，於本年七月十七日在美國紐約演說，謂日本上院將於明年提出一生育節制法案，彼預料將無人反對。

中國近年來，凡論土地與人口之書，多暗示節制生育的。如金兆豐中國通史戶口消長一章裡說：「民數不多，固難致富，民數過多，又易際窮，是所望於有斯民之責者」。即官書如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所編之中國人口問題之統計分析裡說：「……淑種優生之注意講求（即包括節育）尤為今後自力更生致富圖強之重要原素」。

大陸上人口之壓迫爲近二百年來新發生之現象，前文已一再言之。我國歷史家與政治家但見二千年來歷史之教訓，以爲限田與均田足以打消兼併之害。不知現在我們的限田政策，不過救目前之急，非長久治安之道。因爲耕地太少，人口太多。不限誠有大害，限亦祇能達到吃不飽餓不死的苦境，無論如何增加生產，有其一定限度，且只能救一時之急。無論政治如何改良，租稅如何減輕，兼併如何限制，土地如何分配，此問題如不解決，人民生活程度無法大量改進，全民文化無法提高。這人口加於土地的壓迫是從漢到明所沒有的問題，現在放在我們眼前了。

四 森林問題

人口滋生過速，還有一個問題，就是把森林毀壞了。清代解決了衣食問題，可是沒有注意到燃料問題。於是二百年間把森林燒成了灰燼。到近幾十年中，南方燒掉了森林，祇好燒稻草，北方甚至燒馬糞。還有造房子，製棺材，都要用木料的。臺灣六百五十萬人口，每年燒掉五十萬公噸木柴，此外還燒掉五萬公噸木炭。其他

造房子製傢具等尚不在內。如以臺灣爲比率，四萬萬人口，每年祇木柴一項，要燒去三千萬公噸。一百年之中，要燒去三十億公噸。所以明代每百年平均水災次數爲三十八次，到了清朝，驟增到三百二十八次了。

明代每百年水災次數較元代大減。因明初五十年間，全國廣修堤堰。只就洪武廿七至廿八兩年而論，全國修堤計四萬餘處。黃河經五代之亂而失修，至北宋而始有河患。其根本原因爲北方森林久經毀壞，河道逐漸淤塞所致。明代旱災，並不因大量築隄而減少。因旱災多在北方，亦爲森林久經毀壞所致。築隄可防水災而不能禦旱災。

恢復森林，非五十年不能見效。燃料問題不解決，森林甚難恢復。用煤則須開礦，運煤則須鐵路，治河則須大規模的機器和資本。這都是屬於工業範圍。

五 糧食產量與可能之增產

中國所產糧食，據中農所統計，米麥兩項，每年（一九三一——一九三九）平

均產量共計六千七百萬公噸。以其營養價值而論，可養活二億四千萬人。其他雜糧如大麥，高粱、玉米、豆類、小米、花生、甘薯等類，共計亦六千七百萬公噸，亦可養活二億數千萬人。

甘薯營養價值，因其含水量太高，祇等於米的三分之一，但每畝產量較米多四倍弱。而甘薯之種植，凡隙地荒山多有之。安得按戶而調查，故為統計所不能及。是則其年產決不止二千八百萬公噸，前面已說過了。

故中國糧食產量，足以供給全國四億幾千萬人口。若無天災流行，糧食是夠的。但以交通不便，不能移有餘補不足。故沿海大城市，常須由外洋輸米入口，供給民食。如廣築鐵道公路，則有無可通，自不必費去此不必要之外匯。此又屬於工業範圍了。

又糧食加工，絲棉紡織，煙酒釀製，凡此等等，均屬於工業範圍。他若交通運輸，國際市場，與農產品之價值有密切關係，此又屬於商業範圍了。

農業與工業須血脈相通。合則俱榮，分則俱衰。至於整個經濟問題，須全盤籌劃，已在前篇說明了，在此不必贅述。

中國生產，以農爲大本。但向來政策，取之於農者多，還諸於農者少。若以國際與國內專家，共同對於中國農業問題，以近世科學方法，作有系統的調查，研究，試驗，推廣，實行，實爲破天荒的第一次。農復會成立以來，將及三年。在此三年來，在大陸及臺灣的工作，供給了我們不少的原則和方法。

農復會之工作，已詳該會第一期報告（三十七年十月至三十九年二月）及該會工作簡報（三十七年十月至三十九年十二月）。該兩種報告爲農復會正式宣佈之政策，方法及成果。本冊諸篇，爲本人對於農復會工作之檢討。

至生育節制問題，未列入農復會政策之內，因此事反對者頗不乏人。農復會所注重者，爲謀目前生產之增加，與農民大多數之福利。至百年大計，（除臺灣森林問題已著手研究與補救外）本非在農復會工作範圍之內，故只討論而不列入政策。時機未熟，不願以一時做不到的遠景而害目前所急需的近謀。其對於政治問題，亦抱同樣態度，因農復會的責任並不在此。該會並非不知整個政治和經濟問題爲解決農村基本問題的先決條件。大學說：「物有本末，事有終始，知所先後，則近道矣」。終始先後，是農復會同人所知道的。農復會工作，不過始其所急，先其所能。

其終其後，則是國人共同的責任。

農復會工作的原則與方法，本來在大陸上已形成。在臺灣所推行的，不過略為改動，以適應環境罷了。

本篇之作，在為前途示一遠景，俾不致因近視而碰壁。歷史的教訓，可使人的眼光透出目前環境以外。歷史的演變，可以人力來利導和補救，但不能以人力來阻止或使它回頭。

人口過剩問題，節育不過是一個方法。即使無人反對，在多數不識字或貧苦的民衆中間推行是比較困難的。只要多數民衆有受中等教育的機會，節育就很容易辦到。這就牽涉到教育問題了。其他則為工業化，工業化本身，就是減少農業人口的好辦法。人口聚於工業化的城市裡，因人口與生活的壓力比較明顯，節育的方法容易獲得，所以都市人口較能接受和實行節育。贊成既可不必，反對亦屬無效。兒童過多，生活無法維持，反對節育者，其勢亦不得不暗中實行。久而久之，人人不談，個個實行，美國就是一個好例子。

人口關係國防，為反對節制生育者之最大理由。但我們贊成節育，並非片面的

要把中國人口減少。我們贊成人口與土地應有適當的調劑與配合。否則生活不能提高，內部易起變亂，而國亦終不能強。

吾國在大陸方面，每千人每年生育率爲三十五人，死亡率爲三十人。故每年增加率只五人。這是人力何等的浪費。所以吾人應改良衛生，減少死亡率，節制生育以限制生育率。我們不要多生多死的天然調劑，而要少生少死的計劃調劑。

大陸方面，如推行種籽改良，據農復會專家估計，可增產百分之十。是米麥兩項以年產六千七百萬公噸爲基礎，年可增產六百七十萬公噸。如治害蟲生效，可增產百分之十，亦是六百七十萬公噸，如普遍修築水利，若以百分之十增產計算，則又可增加六百七十萬公噸。以上三項，即可年增二千萬公噸。（這不過是根據已往實施所得平均結果，表示有此可能。實行起來，當然還有其他種種條件和因素。）

這裡所說，不過是米麥兩項，當然其他雜糧的生產，亦會因選種，防除蟲害及興修水利等而相應增加。但是增產要與工業配合，否則穀賤傷農。產愈增，農民愈沒有辦法。聽來好奇怪，事實實在如此。貴州農民以多少米掉多少鹽多少布爲米價標準。臺灣農民以多少米掉多少布多少鹹魚爲米價標準。米少而掉得製造品多則樂

，米多而掉得製造品少則憂。「只要農產品多，食品就豐裕，生活就便宜。」這是我們住在城市裡的人們的話，鄉下人的話正和此相反。

所以農業生產要和工業生產配合進行。我們實行增產，應先在大城市附近或交通便利的地方開始。如是則農產品可以供銷城市，工業品可流入鄉間，城鄉兩得其利。如交通不便或離大城市較遠的地方，只要人民喫得飽就行，硬使他們增產是沒有用的。本來窮鄉僻邑，自產自食是夠的。除非交通搞好，能運得出來，要他們增產做什麼呢？

第二步為推廣交通，交通到的地方，才可以講增產，同時要注意加工和銷路及製造品之供給，如是則始可富國而益民。

日本人治臺灣，以造路為發展農業之基礎，鄉村電力化為農產加工之基礎，即是這個道理。

再次一步，則為墾荒。我國可墾未耕之荒地，究竟還有多少呢？據各家估計，未能一致。主計處參酌各家之言，估定了一個數字，全國二十八省及外蒙古地方可耕而未耕地面積共為七、〇〇九、〇〇〇、〇〇〇公畝。如除去外蒙古四三〇、〇

〇〇、〇〇〇公畝，則爲六、五七九、〇〇〇、〇〇〇公畝，折合一、〇七〇、〇〇〇、〇〇〇舊畝，（主計處民國三十七年出版之中國土地問題之統計分析）。據蕭一山清代史所載，一九四一（民三十年）我國已耕地爲一、三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畝（當爲舊畝）。則我國可耕地約爲已耕地之百分之七十・二。

對於此點，主計處說：「：：此種可耕而未耕地之品質，較已耕地爲劣，或土壤瘠薄，或氣候不調，或地處偏僻，開墾之費用浩大。今後如何應用新式方法以墾殖此廣大之富源，則吾人所當詳爲研討者也。：：」

墾荒之困難，主計處已言其要。即使如願以償，則每人平均不過二・四四畝。加上已耕之每人平均三・一九畝（根據一、三九七、〇〇〇、〇〇〇畝推算而得）。共計不過五・六三畝，合一英畝弱。要想大多數人民生活至相當於先進國家之程度是不可能的。十八世紀（清代）以前，我國平均每人所得已耕之地，最低爲十四畝，上面已經說過了。即使荒地盡墾，尚不及一半。如要農民生活提至相當標準，五口之家須有四十五畝才行（每口九畝）。據童潤之鄉村社會學綱要，我國農民人口佔全國人口百分之七十三・三，即三億二千萬。即以此數計算，如荒地盡墾，加

上已耕田，每一農民平均所得耕地亦不過七·七一畝。

以現在的人口，如不增加，只要把生產技術改良，如選種，防治蟲害，與修水利及施用肥料等，增產百分之五十是辦得到的，但此不過把生活略加改善罷了。如要達到建設鄉村高度文化，則仍不可能。

十九世紀以前，世界任何文化，都建築在少數有閑階級身上。漢唐如此，希臘羅馬也是如此。絕大多數平民，除供給血汗以外，別無享受。在歷史上看來，平民之血汗不過為建築文化之資料，好像工蜂釀蜜，蜜成而享受者另有其人。

二十世紀思想已經發生大變化。我們要講全民族文化，要提高全體人民生活，不能再視平民作工蜂。所以我們要講民主，要謀大多數人民之福利。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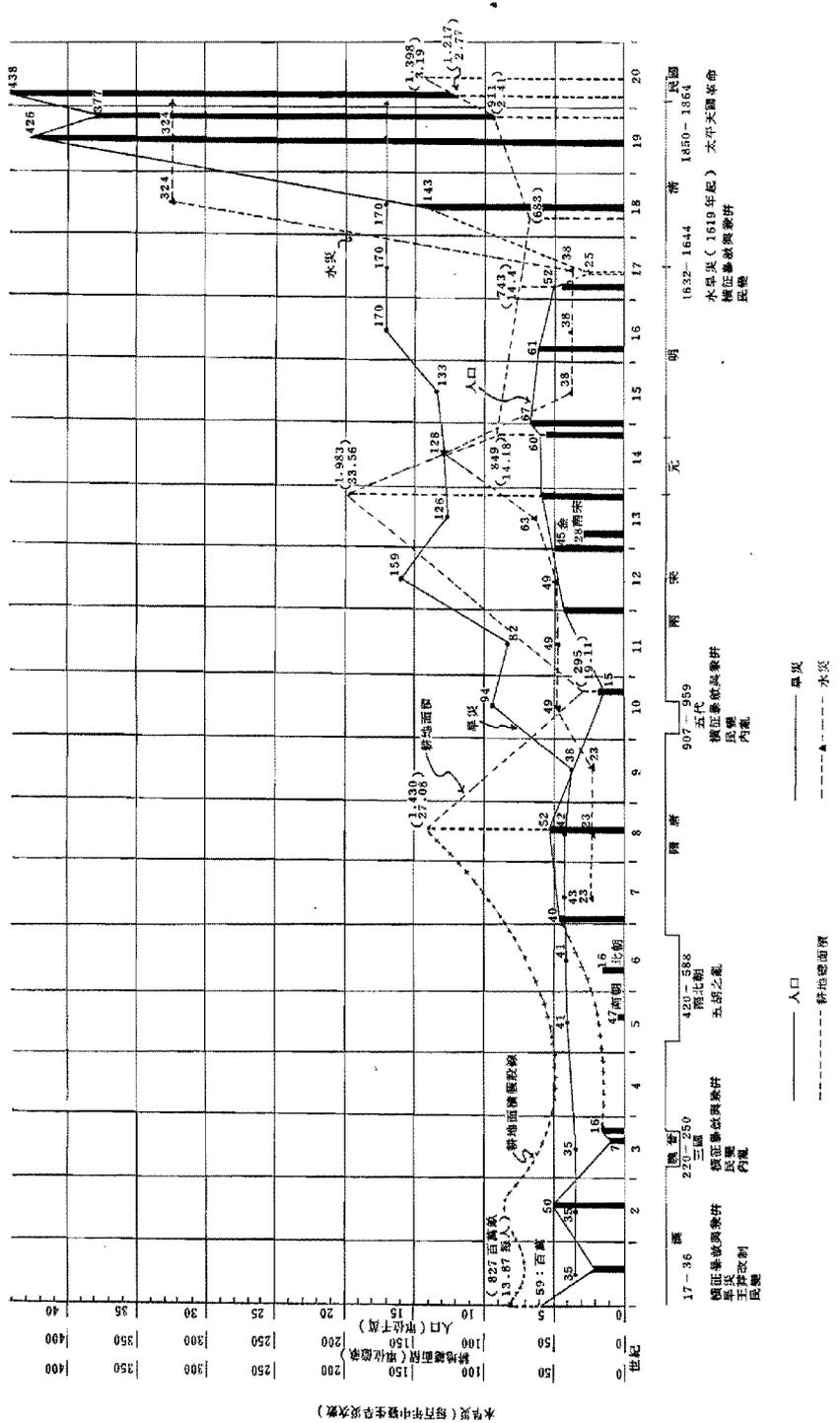
本文之後另附有圖表三張。第一圖說明中國歷代人口由天災人禍與兼併等所生之消長及歷代耕地面積與水旱災發生次數之變遷。第二圖說明近世主要各國農民所有耕地面積及其比較。第三表說明亞洲各國人口，土地面積，已耕地，未墾地及每一人民平均所得耕地面積等。對於本文說明頗多，故特製版附後，用資參證。

本篇係以中文寫作，並已摘要譯成英文，與前四篇原以英文寫作，

然後譯成中文者不同，又本文所論，純係個人見解，特以附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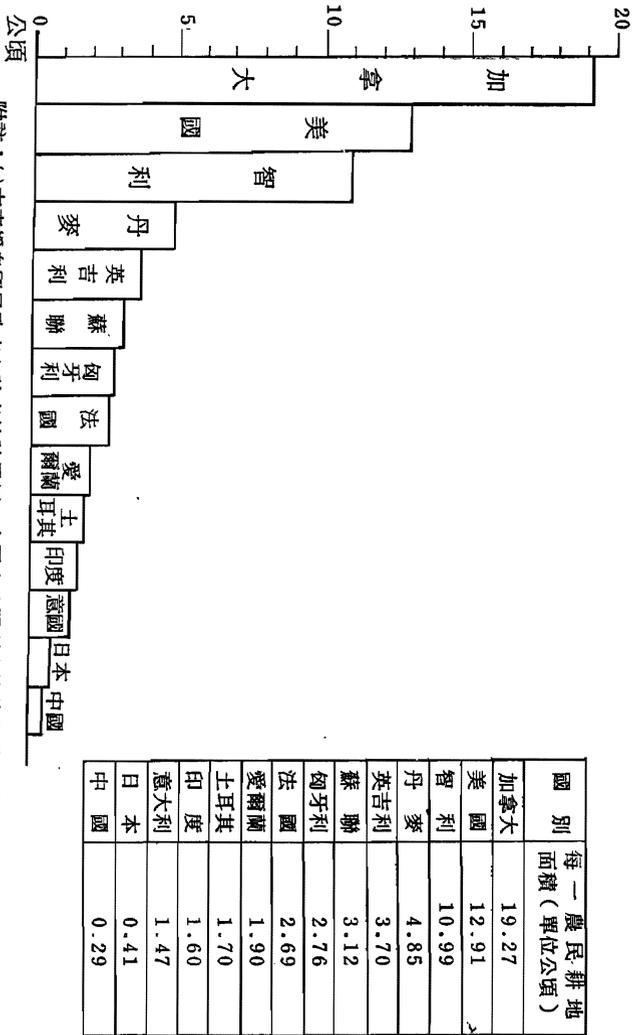
民國四十年七月。

中國歷代人口耕地面積及水旱災發生次數變遷圖表



水旱災 (每百年中發生旱災次數)

各國農民平均墾地面積比較表



附註：(一)本表採自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中國土地問題之統計分析，三十五年編版。
 (二)每公頃合十五市畝，市畝較舊畝略大，為6.66與6.14之比。

亞洲各國土地與人口之關係

國 別	年 度	人 口 (千人)	耕 田				牧場與草原 (千公頃)
			面 積 (千公頃)	佔總面積 之百分比	佔可耕地面 積之百分比	每人平均 耕作公頃數	
阿 富 汗	1947	12,000(1948)	1,150	1.8	—	0.10	—
緬 甸	1947	18,489(1950)	8,754	14.6	60.8	0.47	—
錫 蘭	1950	7,539	1,315	20.0	50.0	0.17	—
中 國	1947	463,000(1948)	91,040	9.6	31.9	0.20	194,133
印 度	1947	346,000(1949)	98,696	43.8	58.7	0.29	—
越 南	1947	27,460(1949)	4,700	6.4	—	0.17	—
印 尼	1947	72,000(1948)	11,000	5.8	—	0.15	—
伊 朗	1943	17,000(1948)	20,330	12.6	23.8	1.20	24,400
伊 拉 克	1930	4,800(1947)	7,750	17.1	84.2	1.62	—
依 色 列†	1950	1,094
日 本	1948	83,196(1950)	5,907	16.1	68.5	0.07	934
約 旦	1949	400(1949)	600	5.0	—	1.50	—
韓 國	1948	29,291(1949)	4,390	21.5	81.5	0.15	—
黎 巴 嫩†	1949	1,247	210	20.6	41.3	0.17	—
馬 來 亞	1948	5,000(1948)	2,121	16.2	76.4	0.42	—
巴 基 斯 坦†	1948	74,437(1949)	21,000	22.6	70.1	0.28	—
菲 律 賓	1949	19,518(1950)	8,180	27.5	68.9	0.42	956
敘 利 亞	1948	3,465(1949)	2,290	12.7	23.5	0.66	4,049
泰 國	1937	18,318(1950)	5,000	10.0	—	0.27	—
土 耳 其	1948	20,935(1950)	19,941	26.3	33.9	0.95	36,195

- 附註：(一)本表採自聯合國秘書處根據聯合國大會決議編送經社理事會之「落後地區國家之經濟發展，土地改革及農業經營之缺點」報告。此報告刊印於一九五一年六月十四日。
- (二)本表材料依原註，除特別標明外，其人口採自各國官方最近統計，土地面積採自聯合國農糧統計年報(一九四九)，統計月報(一九五〇)及人口與生命統計報告(一九四九)等。
- (三)有†標記國家材料均根據聯合國中東各國經濟調查團報告(一九四九)。
- (四)伊拉克數字根據「地租及其問題」一書，(一九三一)。
- (五)泰國土地面積根據 E. H. Jacoby 著「不安定之東南亞農村」一書，一九四九哥倫比亞大學出版。
- (六)本表所列「耕地佔可耕地面積之百分比」，關於中國部份較作者本文所述為低，作者引用數字採自國民政府主計處統計局編之「中國土地問題之統計分析」。實際中國可耕地中有若干土地耕種價值極小，可耕未墾地並不如一般估計之高，自主計處數字較為近理，故作者採用該項數字。

附錄

一、前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署長現任福特基金董事會董事長霍夫曼 (Mr. Paul

G. Hoffman) 先生來函

四十年二月十九日

•••••

大作三篇，業已詳細拜讀，深感興趣。鄙人對貴會之成就，至為忻忭。鄙人前於國會作證時，即曾表示美國使用經費成就之大，無過於

貴會者。此乃

貴會諸委員為解決中國農村問題所作明智之領導與良好之辦法有以致之。

•••••

二、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福斯特署長 (Mr. William C. Foster) 來函之一

四十年一月十六日

• • • • •
大作三篇，業已拜讀。

本署對

貴會在中國大陸及台灣所推行之工作，特感興趣，並殷切希望貴會工作經驗能充份應用於亞洲其他各地，以進行農村改革。

• • • • •
尊著使吾等充份瞭解

貴會工作之思想與方法，而尤以改進農村多數人民生活之農地減租計劃為全方案最有意義之部份。

• • • • •
三、美國經濟合作總署福斯特署長 (Mr. William C. Foster) 來函(211)

四十年五月廿九日

• • • • •

承惠「論美國世界性援助方案」一文，經已拜讀。

尊作意義深遠，業交本署各單位傳閱。葛利芬君頃正計劃將

大作重印，俾能分發本署遠東各分署參考。

貴會所獲經驗，對於解決亞洲多數人民之問題極為重要。美國頃正循此方向從事若干工作，以期能協助亞洲人民解決其問題。

貴會目前在臺所遇政府費用及軍事費用增加之困難，本署正在研究中。穆懿爾分署長經常有報告來署，亦曾述及此點。吾等希望能與中國政府合作，在此方面作若干積極行動，俾臺灣人民之負擔不至加重，而建設工作得以繼續進行。

• • • • •

四、美國助理國務卿魯斯克先生 (Mr. Dean Rusk) 來函

四十年五月十八日

• • • • •

尊作「論美國世界性援助方案」一文，業經拜讀。

鄙人對

貴會工作之輝煌成就與先生之貢獻，至為欽佩。

五、美國國務部無任所大使傑塞普先生 (Dr. Philip C. Jessup) 來函

四十年一月二十日

惠函及

大作三篇，均經奉悉，無任感荷，鄙人隨時樂聞有關貴會工作與成就之消息。

六、哈佛大學教授費正清先生 (Prof. John K. Fairbank) 來函

四十年一月三十日

惠函及附下

大作三篇，均經奉讀。原作所述原則與方法，誠為解決中國農村問題最正確之途徑，甚希尊見能廣泛傳播。

本人謹藉此機會，對

先生近年工作致最大敬意，並深信此項工作在中國根本建設上，將留下一永久紀錄。近年以來，吾等爲環境所左右，除失敗外，未嘗有何成就，實深慚愧。

•••••

七、美國參議院撥款委員會專員福路先生 (Mr. Robert F. Trow) 來函

四十年六月一日

•••••

大作「論美國世界性援助方案」乙份，已經拜讀，極感興趣，並已擅將尊作在本會數友間傳閱。

此次在臺獲睹

貴會工作之成就以及貴會同仁之努力精神，受益良多，並深欽佩。

•••••

八、美國經濟合作總署助理副署長克利夫蘭先生 (Mr. Harlan Cleveland) 來

函

四十年五月廿九日

• • • • •

大函及附下「論美國世界性援助方案」一文，均經拜讀。

尊著充份表現

先生廣闊之智慧與深切之見解，欽佩良深。大作已分送本署各分署及各關係政府部門參考，俾有關落後地區開發計劃之決策人士能對先生高見加以注意。

• • • • •

九、美國經濟合作總署遠東司葛利芬先生 (Mr. R. Allen Griffin) 來函

四十年五月廿六日

• • • • •

惠函及附下「論美國世界性援助方案」一文，均經拜讀。福斯特署長業已函復

先生致謝，函述各節，本人完全同意，茲不復贅。

大作業已分送本署各分署，華府各關係部門，國際發展局及國會，俾原作寶貴之意見，能廣為各方面瞭解與參考。

•
•
•
•
•

臺灣人口問題各報評論專輯

目次

前言	一〇三
出生率高人口膨脹希望大家節育	一〇五
人口不斷的增加將造成社會貧窮	一〇八
蔣夢麟呼籲實行節育	一一二
家庭計劃協會進行勸導節育	一一四
蔣夢麟頭顱作抵	一一五
人口增加與保護耕地	一一七
眼看要「抖」起來	一一九
談節育	一二〇

節育與避孕	112
人口壓力	116
多生多死	117
節育再談	119
教重於養	131
人口急劇增加威脅臺灣	133
重質乎？重量乎？	139
人口壓力不容忽視	142
千分之三十六	145
周主席向省臨議會報告施政	146
嚴重的臺灣人口問題	149
看臺灣人口問題	154

前言

自蔣夢麟先生於本年四月十三日向台灣各報提出「讓我們面對日益迫切的臺灣人口問題」一文以後，本省各地報紙，以及部份香港及美國報紙，均曾先後節載此文，並著論探討此一問題，或提出積極主張，或表示修正與補充意見，或提供具體解決辦法，反應異常熱烈。足證本問題確為臺灣當前面對之一重要問題，且已普遍受到各方重視。爰將各報所刊有關此問題之社論與所提供之主張或建議（逾本年五月十二日止）彙為本輯，以供關心臺灣人口問題者之參考。

臺灣人口問題各報評論專輯

出生率高人口膨脹希望大家節育

蔣夢麟博士提出主張

家庭協會籲請男界合作

（本報訊）蔣夢麟士昨天（十三日）提出警告說：臺灣人口照現在的出生率推算，十年以後將達一千五百萬人，不出二十年，就增加到二千萬人。這種現象，實在是我們經濟發展中的一種隱憂，問題嚴重到非得馬上注意和尋求解決辦法不可。他希望大家注意節育，以緩和人口膨脹的威脅。

蔣博士在一項資料中指出，臺灣每年增加的人口，等於一個高雄市，增加人口所消費的糧食，是一個石門水庫所能增產的糧食。他說：臺灣現有人口一千萬，每年正以百分之三·五的增加率在增加，每年淨增三十五萬人，相當於一個高雄市現

在的人口，這三十五萬新增人口的基本需要，在「育」的方面，每人每年以消耗食米一五〇公斤計，年需糧食五萬二千公噸，以二·二元一臺斤計，折合新臺幣需一億九千萬元；在「教」的方面，以每班五十人計，每年全省國民學校需增設七千班級，增建教室七千間，每間以六萬元計，共需四億二千萬元，每班平均以一個半教師計算，共需教師一萬人，每一教師以月薪六百元計，全年七千二百元，一萬人年需七千二百萬元；在「衣」的方面，每人每年以二百元計，年需七千萬元，三項合計共七億五千二百萬元，他又說：現在建築中的石門水庫，將來完成之後，年約增加糧食七萬二千公噸，而現在每年出生人口三十五萬，年需糧食五萬二千公噸，水庫每年所增產的糧食，卻祇要短短的一年零四個月，就被新增人口吃光了。

蔣博士認爲問題相當嚴重。他說：依現在每年有百分之五的糧食增產，推算人口增加到民國五十年的時候，生產剛夠消耗，已無餘糧可資出口。再下去，糧食生產已不足應人口的需要。而在人口激增的趨勢下，就業將感困難。生產與消費失卻平衡，生產與消費都會下降，資本無法累積，沒有儲蓄投資，經濟無法作進一步發展，社會文化也必停滯不進，而人民的健康，與教育也必日益衰退。

這位被人稱譽爲通人的學者指出，資源與人口應有合理的平衡。他說：資源與人口之間有一定的比率，超過這一限度，生活水準必定降低，如果我們希望把臺灣造成一個富庶康樂的地方，就必須正視這個問題。

（本報訊）指導婦女節育的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昨天（十三日）呼籲先生們合作。該會的一位負責人士說，許太太們真願意聽從該會的勸導，但是據太太們的訴苦，是不能得到她的先生的合作。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係於民國四十三年成立，指導兒女眾多的家庭節育。該會在桃園縣的六個鄉鎮，臺北縣的新莊，對一百多個村里進行該項工作，按戶勸說，大部份收到效果。此外在彰化縣的四個鄉鎮，該會以召開母親會的方式，宣傳節育常識及方法。

中央日報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人口不斷的增加將造成社會貧窮

蔣夢麟博士呼籲實施節育

認爲本省人口增加率已構成威脅

（本報訊）蔣夢麟博士，昨（十三）日說：現在臺灣的人口每年都在不斷地增加，如果繼續這樣增加下去，五年之後，將造成一個嚴重的社會問題。

蔣博士昨日在一項記者招待會中，就臺灣日益迫切的人口激增問題，提出以上警告。他呼籲各界說：我們要解決這一人口激增問題，惟有從增加糧食生產和家庭計劃（生育限制）兩方面著手，但前者是有天然條件所限制的，惟有從後者入手，將能獲致較適當的解決途徑。

蔣博士以確鑿的人口數字統計，來證實這一警告說：臺灣現有人口一千萬，每年正以百分之三·五的增加率在增加，那就是說臺灣每年淨增卅五萬人，約相當於一個高雄市現在的總人口數。

蔣博士說：這些每年新增的人口，即就吃飯、教育及衣著三方面的需要言，每

年就需要七億五千四百萬元費用，這筆數字是十分驚人的。

蔣博士在提出這項警告前，曾就歷史上對「土地」「土地所有權」「土地與人口」三項問題之演變提出說明，他說：在秦始皇廢封建，開阡陌以後，當時就發生土地問題，但當時因人稀地廣，並無巨大影響。迄東漢期間，人口劇增，於是接著發生「土地所有權」問題。但至清朝乾隆之後，由「土地所有權」問題而演變為今日之「土地兼併及人口」問題。蔣博士說：自從我們實行 國父「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後，土地兼併問題已獲致妥當的解決，但遽增的人口問題，卻給我們帶來另一個隱憂，那就是我們將如何騰出一個生存空間讓這些每年新增的人口活下去。

蔣博士譬喻說：臺灣人口現在正成爲一個X型，這一型的上下兩部份正代表老年人和幼童，換言之，他們都是生產能力薄弱甚至不能生產者，惟有依賴中間這一層爲數極少的生產者生活，這項負荷是很大的，因此造成一個極嚴重的問題。

蔣博士呼籲說：我們必須正視這一由于人口激增所造成的嚴重問題，它正威脅著我們。

蔣博士說：臺灣每對夫婦平均生育子女六人，凡生育子女三人以下之家庭，其

子女的成活率達百分之九十，凡生育子女十人以上者，其成活率則降至百分之六十八，即凡育有十人以上之家庭，其成活之子女不過六、七人，夭折三、四人。此在人力、生命、資源與經濟各面，都可以說是一種浪費。

蔣博士表示，他提出這項警告，無非在引起一般的注意，進而獲致廣泛之討論來解決這日益嚴重的問題。他指出，世界上部份國家都已實施限制生育的工作，它們實施結果大多有良好的結果。

他強調說：人口的激增，只能造成社會之貧窮，因生產與消費失卻平衡，資本不能累積，生產不能繼續增進，而人口卻不斷增加，人類的生活水準自然要降低。因此，提倡節育問題將為當前一重要課題。

在招待會中，農復會生產組張組長亦提出一個農業生產數字之報告，他指出，截止一九七〇年止，臺灣穀子之生產總產將為二七六萬噸，僅較去年的生產量增加九十萬噸，但，這項數字已竭盡一切可能之運用所獲得，如要適應激增的人口數字，有顯著的不足處。

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劉女士則就推行節育工作情形提出報告，她指出，現在節育

工作正在桃園、彰化等地推動，一般反應良好。但仍須作廣泛而努力的推行，她希望能獲至社會之支持。

接著，蔣博士在結論中說，人口之激增問題是一項必須獲得解決的問題，至于在節育方面著手，是否正確，是否能獲致妥善的解決，則希望社會人士廣泛交換意見，俾能共同促進我們的幸福，甚至惠及我們後代的子孫。

新生報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蔣夢麟呼籲實行節育

謀臺灣富強康樂

須解決人口問題

（本報訊）蔣夢麟博士昨（十三）日呼籲全國人民實行節育，以解決日益迫切的人口問題。蔣氏說：「如果我們希望把臺灣造成一個富庶康樂的地方，那我們就必須正視這個問題，如果我們自己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自然調節作用終會來替我們解決的。」他接著警告說：「那將是很不幸的。」

蔣博士及若干位農業生產、節育方面的專家，昨天下午四時在農復會爲二十多名記者晤談。蔣博士說明日益迫切的臺灣人口問題的嚴重情形後並答復問題。他說，節制生育是解決人口問題的一個較有效辦法，當然全力增加農業生產，發展工業建設也是非常必需的。他說，執行節育，並不需要太多的經費。他認爲臺灣人口增加每年能降到百分之一·五（現在是三·五）就比較緩和了。他說，人口增加，農村人口較都市人口的增加爲多，執行節育，都市較易有效，但全省的三百多個衛生

站人員都可向農民們灌輸節育知識。

農業生產專家張憲秋博士說，臺灣農業生產盡一切可能運用的技術改進及投資，估計在一九七〇年米谷可達二百七十六萬噸，甘薯可達三百五十萬噸，但在水利、肥料及病蟲害方面的投資則將比現在還要高。蔣夢麟博士對此加以補充，他說，人口增加吃的問題當然重要，但教育問題及其他生活所必需的還要重要。他說，人不是豬，不能吃了就算完，臺灣是在保存我們中國文化，要反攻大陸的，在今天這個新戰國時代，我們是魯殿靈光。

另一位專家在答復節育問題時說，簡單易行的節育方式是使用男子套，不過鄉下人難以接受。中國家庭計劃協會的一位劉小姐則說，根據他們過去多年工作的經驗，節育有注射鹽水，施用海綿，戴子宮帽，計算月經安全期等，最安全是用男子套，目前在日本已有百分之五十至六十的男性使用男子套，而且打胎也成合法化。不過在我們所接觸的婦女中，節育尙難得到她們先生的合作。蔣博士也認爲既然戴男子套就容易就使用男子套好了。

聯合報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家庭計劃協會進行勸導節育

多產非福計劃生育

求嗣亦可請求指導

(本報訊)農復會鄉村衛生組技正柳錦霞昨日說：男性用的橡皮保險套，最具有防止生育的功效。這是根據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推行五年來的經驗，與日本歷年來推行節育的結論。

柳女士說：接受農復會補助的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是幫助人民計劃生育子女，凡需要兒女者，該協會可以給與如何獲得兒女的指導；而子女太多者，該協會亦給與如何防止生育的指導。

柳女士說：目前中國家庭計劃協會正以下列兩項方式，勸導人民不要濫育：1 挨戶挨家勸導，正進行中的有桃園縣的五個鄉鎮，與臺北縣的一個鄉鎮，共一百多個村。2 在彰化縣十個鄉鎮，請衛生所舉行母親會，介紹節約知識。

根據五年來的經驗，柳錦霞認為：如果不得到先生們的合作單向婦女們宣傳，

是很難得到效果的，至於如何才能防止生育，她說：月經前後的安全期有效果，但不一定可靠，女用的子宮帽也是如此，最有效者是將男用套與安全膏配合使用。

中華日報 四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蔣夢麟頭顱作抵

憂心臺灣人口激增的蔣夢麟博士，昨天曾公開強調提倡節育的決心，他說：「我現在要積極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這個運動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那樣，在臺灣太多的人口，至少可以減少我這一個人」。

多子多孫是中國的傳統觀念，臺灣雖然人口激增，威脅到現有的安定和繁榮，對於節育，一個正常的家庭是不太願意採取的。然而蔣博士卻堅持應該節育的觀點，透過農復會的關係，在農村裡展開。據蔣博士說：數年來已經推行得很有效。

雖然蔣博士是有堅定的信心，卻因顧慮到環境的影響，而沒有由農復會公開倡

導節育運動。一件有趣的事更足以證明蔣博士之對於提倡節育是有苦心孤詣的。

數個月前，聞名世界的一生為提倡節育而向各國鼓吹的山額夫人，曾由美國抵達香港，宣揚節育的重要性，當時山額夫人有意來臺演講節育，曾函與蔣夢麟博士討論這件事，蔣博士很誠懇的復信告知山額夫人，請她不要來。蔣博士說：如果你不來臺灣，我們這裡或許還可以無阻的推行節育，我們也正在臺灣沈默地做這件事；如果你來了，因為你的名氣太大，成了眾人注意的目標，或許反而會引起困難。這是蔣博士的苦心，實際上，蔣博士之希望眾多的農民、漁民，甚至市民，能夠瞭解節育問題與本身的關係，其目的，也祇是爲了如此可以更多的改善他們本身的生活與增加福利。

由此可以證明，蔣博士之寧願殺頭，並非一時衝動下的說法了。

自立晚報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四日

人口增加與保護耕地

蔣夢麟博士提出的本省人口與節育問題，已引起社會人士普遍的關切與重視，以臺灣四面環海的一個島，要養活增加無止境的人口，確實是一個極端嚴重問題，節育之必須倡導實施，已是勢所必然，不容懷疑。

與人口問題以俱來的一個迫切問題，就是本省土地的利用與開發問題。耕地的面積愈大，養活的人愈多。年來政府及民間，對於土地的開發與利用都已盡了最大的努力。許多原為灌土野草叢生的地區，今天都已變成了蕉園茶園或香茅園：許多原為潮汐汎濫的沙灘，今天都變成了魚塢。鹽田，或農作地，土地的生產增值得在積極開發與利用下，大見增加，這種以人力與自然鬥爭的輝煌成績，確實值得誇耀。但是，由於天然環境的限制，即令是變丘陵為沃野，化荒田為良田，一時食糧問題，不致發生，長期下去，終不足以適應本省人口激增之趨勢，土地利用開發與節育運動，必須同時並進，雙管齊下，始可以使嚴重的人口與食糧問題趨於和緩。

擺在目前的一個迫切而必須注意的問題，即是耕地的保護問題。近數年來，開發的新地，固然不少，但耕地被佔用的數字，亦復大得驚人，以臺灣全省各大城市

及鄉鎮而言，建築的範圍，日益在擴大，昔日之耕地，都已變作了連屋高樓，而許許多多公營建築物，更佔用了不少耕地，這雖然是人口增加，都市繁榮的自然趨勢，但由於我們沒有一貫的政策及計劃，浪費寶貴的耕地之處，實所在多有，尤其許多不急之務的公營建築，其浪費寶貴耕地，更是觸目皆是，如果我們把全省各縣市近年來佔用耕地的數字加以詳盡的統計，即可發現此一問題的嚴重了。

因此，在一寸土地一寸金的今日臺灣，在土地利用重於一切的今日臺灣，在土地開發受到自然環境限制的今日臺灣，我們有絕對保護耕地的必要。住的問題，固然必須解決，但應當儘量利用山地荒地，而避免佔用耕地，以目前臺北縣市而論，一切公私營建築物，可儘量向山區發展。山之涯，水之濱，尚有許多可以開闢以供建築的空地，只要交通水電各種建設，能夠配合適應，則一切均不成問題，唯一的前提，是要政府作通盤的籌劃，劃定新的建築區及訂定保護耕地政策，嚴格實施，非然者，將來隨人口之增加，耕地被佔用之數字必愈大，勢將形成一個嚴重的問題，這一切都需要政府當局預爲之謀。

眼看要「抖」起來

陳紀澄在他的「賈雲兒前傳」裡有一段有趣的描寫，賈雲兒在遭受重大打擊後，心煩意亂，莫知所從，就到書本裡去找格言，她非常驚異的發現，所有的格言都有正反兩面。

不錯；有「少小不努力，老大徒傷悲」就有「人生行樂耳，富貴須何時」，有「禍從口出」就有「君子必辯」，有「人生始於四十」又有「死亡始於四十」，有「衣食足而後知禮義」又有「飽暖思淫慾」：：。麻煩！

不錯，「多子多福」是一句格言，證明中國人不怕孩子來，可是，「每一個孩子都是債主投胎」，「無冤孽不成父子」，這些成語又怎麼說呢？

讓我們老實招供，子女太多是使父母發抖事情，尤其是貧困的父母；人口過臞是使政治家、社會學家發抖的事情，尤其在生產落後的地區。如果我們任憑它「每年增加一個高雄市」那麼十年之後，大家發抖。

要解除人口的壓力，可以節育也可以移民，移民足使壯有所用，節育足使幼有所長。移民巴西一案連會也不見開，遑論「議」「決」「行」，原因大家都知道：

不願意人力外流，剩下可行的，只有節育一法，而力主推行節育的要員，又似乎只有蔣夢麟氏一人。前幾天蔣博士爲這個問題發表演說時動了感情，說「我現在要積極提倡節育運動：：，如果一旦因我這個運動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這種激情的來源，就是「先天下之發抖而發抖」。另外的人似乎多半比他遲鈍。

政府在十年前大陸播遷之際就動手測量橫貫公路，那是臨危不亂，有遠見！而如果能爲十年後的人口問題早爲之計，是安不忘危，有遠見！——這比甚麼子曰詩云的格言都中用。

徵信新聞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七日

談節育

蔣夢麟博士語重心長呼籲國人節育，日來各方意見甚多，大都在原則上表示贊成。不過，贊成節育的人，十九是知識份子，他們不但贊成，而且早已躬行實踐了。可是，問題卻發生在一般知識水準較低傳統觀念根深蒂固的民衆身上，我們知道

，中國人視兒女衆多爲有福，是千百年傳下來的牢不可拔的思想，這種思想，直到今天仍然支配著絕大多數的農民與工人。在臺灣言臺灣，我們只要有機會接觸一般農工同胞，你就知道，他們不管本身怎樣爲生活而艱苦奮鬥，但對於子女的來臨，依舊抱著歡迎的態度。民間的口頭禪是，不管張三李四生了多少兒女，只要發現有添丁進口的跡象時，人家照樣要恭維他「好命」。在這種傳統思想的支配下，兒女（特別是兒子）代表著前途與希望，似乎兒女越多，前途愈美麗，希望愈無窮，你要他節育，他肯聽麼？因此，我們認爲臺灣的節育問題，如果把它變成一項「工作」，那麼，這個工作的重點，就得放在農工這一廣大對象之上，而如何說服農工同胞，使他們瞭解多育不是「好命」，而是「要命」，尤爲開宗明義第一章。所以我們的意見是，節育的對象，農工重於知識份子；節育的宣傳，農村重於都市。至於節育的生理指導，那是人們在觀念上接受了節育的要求以後的事。

新生報 四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節育與避孕

幾位婦產科專家的意見

本省人民生殖率高

臺灣的人口增加，現已受到各方的重視。據蔣夢麟博士指出：臺灣人口，仍以每年百分之三點五的增殖率繼續增加的話，十年以後，臺灣的人口將達一千五百萬，二十年後就有二千萬人口了。這個龐大可驚的數字，將嚴重阻礙臺灣經濟的發展，也將產生更多的社會問題，因此適當的節育，顯然是必要的了。

臺大醫院副院長魏炳耀的分析說：臺灣人民的生殖率，更爲可怕，他指出：臺灣人口的增殖率是每年百分之三·五。臺灣人口現在是一千萬，估計其中二十歲以下以及未結婚男女的人口佔百分之六十，再除掉年老不能生育的夫婦，則每年生育女的夫婦只佔全省總人口的百分之四十以下，他說：臺灣的四百萬已婚的能生育男女，每年可生育四十萬嬰兒。蔣夢麟博士也曾指出，臺灣的農家夫婦，平均每對有六個小孩，這是一個遠超過歐美國家每對夫婦平均所生孩子的數字。

適當的節育很必要

臺大醫院的副院長邱仕榮、魏炳耀及省立臺北醫院副院長徐千田，均曾就醫學的立場，指出適當的節育是必要的。因為生育子女太多，非但對母體的健康有很大妨害，又因母親不能盡心撫育，而有營養不足，發育不全的情形。

這幾位婦產科的醫學專家指出：生育對母體的健康是不致有影響的，但生育子女太多的母親，則由於胎兒吸收母體的營養，每次生產時的流血，及生產後對於嬰兒的辛勤撫養，常導致母親的睡眠不足及貧血諸症，並且由於每次生育的的血壓增高、將可促使血管的硬化。邱副院長並指出：生育子女太多，也可引致女子的慢性腎臟炎。徐千四醫師認為節育應視各人的經濟環境，及身體健康情形而定。他們並特別指出：若干婦女過分重視自己的健康，並恐懼生兒育女容易衰老，而千方百計的避免生育，甚至於懷孕後予以打胎，都是錯誤的，尤其是打胎對於婦女健康的影響，比生育太多更為嚴重。

打胎是不道德行爲

邱仕榮醫師及徐千田醫師指出：打胎等於是施行一次手術，常使子宮裂開，頸

管發炎，發生子宮頸管無力症，而致以後懷孕時再易早產。打胎後在子宮內必留有疤痕，使以後懷孕時胞衣易陷入肉中而致流產。徐千田醫師又說：打胎被視爲是不道德的，而且打胎在我國爲法律所不許，多數醫師均不屑爲。在日本，以前每年都有很多因打胎而死亡的婦女，後來日本政府乃使打胎合法化，規定凡需要打胎者，可向政府聲請，經政府核可後，再向政府指定的醫師處去打胎，這樣一來，才使因打胎而死亡的人數驟減。

事前避孕有利婦女

這三位婦產科的醫師，都一致認爲與其在懷孕後打胎，則遠不如事前避孕對婦女有利。他們指出，現在避孕的方法很多，而且多半簡單易行。據邱仕榮副院長解釋說：所謂避免男子精蟲，與女子的卵子相會合而言。一般的避孕方法，有以下四種。

(一)是排卵期的推定。他解釋說：女子的排卵有一定的時期。據日本荻野醫學博士的一篇專論中稱：女子的排卵期，每月只有一天，即在其下次預定月經前十四天左右，而卵子生命只有數小時，所以只要在該日的前後數天（最好是十天），不要

性交即可避免懷孕。

(二)是紮子宮，婦女經紮子宮後，即永遠不能生育，但也有百分之一的例外，即是由於紮子宮時手術上的疏忽所致。

藥物避孕方法增多

(三)是基礎體溫法，女子於排卵期體溫會突然降低（女子通常體溫是九十八度四左右，排卵期則降至九十六度左右），所以婦女可於每日清晨剛醒時量體溫一次，如果發覺某日體溫突降，則宜於該日起三日內避免性交，就不致於懷孕。

(四)是利用藥物避孕，由於各國醫生們的不斷研究，利用藥物避孕的方法已漸增多。邱仕榮醫師說：美國現在有很多避孕的藥膏，例如Creme Nel等，以及若干種的發泡劑，但都不太安全。徐千田醫師說：如果於搽上藥膏後，再用子宮帽，則據美國華盛頓大學的統計其安全率達百分之九十。邱仕榮並透露：美國最近發明了一種可使女子停止排卵的藥，服用後可使排卵期後移，女子可於性交前服用。但此藥服後是否對女子身體有害則尚不得而知。

設立機構指導節育

對於節制生育，三位醫師雖都認為有其必要，但認為大家也不應盲目節育，最好能設立一個機構，依照美國山額夫人家庭計劃研究會的辦法，研究一般的社會情況、生活水準、嬰兒撫養所需費用等，製定一個客觀的標準，而後公之於衆，使大家酌量自己的財力以及其他條件，來自動的進行節育，並由已設立的機構予以節育指導，視其環境，條件，告知最有效的節育方法。

人口壓力

中央日報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十八日

蔣夢麟博士最近爲臺灣人口壓力日增，而大聲疾呼節育。他說：臺灣人口到去年底已超出一千萬人，照每年增加三·五的百分率計算，不出二十年，人口就要加倍。語重心長，可謂憂時之言。

問題是節育並非易事。山格夫人在印度鼓吹多少年，印度窮苦人民生育率之高，仍然高佔世界第一。如果人民文化水平和生活水準不提高，則節育運動是極難推

行的。以中國而論，子女最多者常爲漁民，佃農及苦力，何以故，貧與愚而已。

原則上，我們當然贊成節育因爲多生子女而不能善爲教養，則提增社會負擔，國家亦難進步。不過光憑節育來解除臺灣人口壓力，似還不甚可能。今天臺灣的一切問題，都有待於反攻復國才能一次總解決。大陸光復之後，臺灣人人都有機會回到大陸去工作，那時臺灣人口增到三千萬，還嫌少哩！

中央日報 民國四十八四月廿一日

多生多死

在計劃生育的呼聲中，想起了一則故事。

一個印度婦人死了兒子，悲痛逾恆，抱著死尸到處尋找起死回生的良藥，最後經人指點，去求釋迦牟尼。釋迦說：「你到從來沒有死過孩子的家庭裡，要一把芥子來，孩子吃了就能還陽」。

這位可憐的母親立刻挨戶去討。芥子和同情都很容易得到，只是：「你們家裡

也死過子女嗎？」他們都答道：「生存的少，死亡的多，請你不要提起我們深心的創痛罷！」她奔走了好幾天，所得到的回答都是一樣，失望和疲倦之餘，內心的痛楚漸漸減輕，就回去把兒子的尸體埋葬了。

在印度，早婚，貧窮，父母對孩子的數目不知控制，生得多死得也多，大概就是上述故事產生的背景吧！多生多死變成一條定律，一種命運，人人如此，代代不改，做父母的也麻木了，生孩子時並不特別喜歡，對小生命的夭折也不特別悲哀，大家認了！

印度人編造的這個故事完全可以移到中國。朱介凡氏最近發表的短篇小說「糟塌了」，描寫舊日大陸上某些家庭在「多生多死」中衰敗，極可浩嘆。臺灣怎麼樣呢？兒童的死亡率是百分之六十二，也是不得了！

但是在臺灣，如果一家之中子女不超過三人，這種家庭的兒童死亡率就降到百分之十以下。生得少，父母照顧得周到，家庭財力能作一切必要的支付，死得也少。孩子不但能活，而且可以活得好。於是計劃生育為家庭幸福、子女前途、社會安寧所賴。所以計劃生育運動值得贊助。

在生物界，許多生殖都有浪費的現象，把後代一大把一大把的往外撒，讓其中倖未死的少數傳宗接代。萬物之靈呀，你甘心嗎？

徵信新聞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廿一日

節育再談

關於節育一事，蔣夢麟博士主張由民間團體自動推行，此亦好意見之一。因為叫老百姓自己去搞，不致弄得官樣文章，不但能求普遍，且可收深入之效。此外，中共前年也有過這種運動，但係硬性而官式的，結果刺刀和「人民警察」管不了房中之秘，徒然增加許多笑話與悲劇。我們不那麼愚笨，正顯得我們重視人民的基本權利（民主），更懂得拿科學的方法，去為老百姓造福，只是怎樣實際推行？這倒是一件值得研究的事。

中國人生兒育女，往往免不了求神問卜，或在送子觀音處許下大愿，然而這係迷信，同時菩薩有好生之德，頂多替愚夫愚婦配給子女，如果要減少或是豁免，祂

決理不了這筆閑賬。這也就是說，菩薩解決不了問題，問題在於爸爸和媽媽自己。

第二是這種教育並不簡單，怎樣避免「無心插柳柳成蔭」的現象，其中包括事
前教育和既成事實兩個問題。前者，我認為可以編印一種小冊子，於結婚時發給新
郎新娘參考，後者較麻煩，中共曾經要孕婦喫蝌蚪，叫她們喫焙乾了的蚯蚓墮胎，
結果產生許多悲劇。我曾說這是一種科學教育，從事先防範到事後補救，工具與技
術都得科學化。菩薩既不管，喫蝌蚪更違反科學，其中這些實際問題，主管機關責
無旁貸，決不能裝聾作啞束手旁觀。

其他，我還擔心偽醫密醫們和黃色文化販賣者從中作怪。他們眼快手快，說不
定十天半月後，市面上就會發現黃色及其指導生育的書刊，而那「保證避妊」事實
乃與奮劑的祖傳祕方，亦將隨之應市，這些殺人不見血的凶手，我們更須切實防範
。

教重於養

臺灣人口增殖率之速，是近年來整個國民經濟中一項頗爲主要的煩惱，這個煩惱不但使糧食的消耗形成爲一種威脅，而且也使全部經濟建設的成果爲之黯然失色。這是有心人早已覺察和憂慮到的，不過最近由于蔣夢麟先生的專文發表，才開始引起普遍的重視。

住慣獨門獨院的人也許不容易發現，若是住在什麼新村之類的公家宿舍區內，便可以瞭然于臺灣人口問題之嚴重。你假如再進一步加以注意，那些成天在空地上追逐喧鬧的孩子們，似乎並沒有得到應有的照顧和管教。

一方面由于室內空間太小，自然不夠孩子們施展，二來由于大人們希望有片刻寧靜，無形中鼓勵孩子向室外去發展，三則孩子人數一多，想要照顧嚴管一下，也不勝其煩，于是化繁爲簡，便是眼不見，心不煩，索性讓大家各得其所。于是在某種情形之下，就形成了放任喧鬧的局面。

就孩子們而言，他們不知道何者爲對，何者爲錯。在養魚池內玩水或游泳，打開自來水龍頭作爲背水爲陣的武器，搖撼幼樹，踐踏草皮，攀摘鮮花，甚至用石子

互擲爲戲終而打破人家窗門玻璃等等，這一切都是極自然而無礙的，只要大人不出而阻止，他們會玩得忘神盡興而後止。什麼環境美化、公共秩序、公德心之類的名詞，不過是教科書上的字眼，與實際生活並不會發生多大關聯，當然裝不進他們的小腦袋。久而久之，在學校和家庭之外還形成一股風氣，連教師或家長想著手糾正時，已感到自己力量的微薄，決不足以與那種影響力相抗衡。此時，少年犯罪的案件也就日漸增加，終而形成爲一個社會問題。

我們不要慨嘆什麼世風日下，因爲每一個時代都有每一個時代的問題和煩惱，可是卻也不能坐待別人來替我們解決問題，排除煩惱。在今天，每一個有家的人肩上都負著一份責任。你暫且不去管人家的事，先問問自己對子女有沒有盡到自己應盡的管教責任。子女人數既然已經是一個既成的事實，那末徒然感喟已無補于事，最要緊的還是拿出勇氣面對這個事實，灌注慈愛和關切在孩子身上，使他們的生活行動能夠循著父母所設定的規範或軌道，漸漸定型。

所以，我們與其顧慮養之不易，還不如懷記教之重要。

中華日報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廿日

人口急劇增加威脅臺灣

蔣夢麟認為五年後將發生嚴重問題

解決辦法應積極推行節制生育工作

（本報臺北通訊）據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最近的統計：照年來臺灣每年人口膨脹率達百分之三點五推算，十年之後的臺灣人口，將達一千五百萬人，不出二十年，就會增加一倍成爲二千萬人。

負責主持中國農村復興工作的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博士於檢討此一問題時，認爲：照此膨脹率不斷發展下去，五年之後，臺灣將發生相當嚴重的社會問題，到那時，人民的生活水準將大爲降低，衣、食、住、行、教育，以及其他問題將紛至沓來，而難以獲得解決。

在若干年以前，蔣博士曾照當時臺灣人口增加的趨勢預料到民國五十四年臺灣人口將增加至一千萬人，但據最近臺灣省民政廳的調查公佈：在四十七年年底止，

實際上臺灣人口的總數，已超過一千萬人。經過農復會和有關各方的專家們依照現在的出生率和死亡率所作的縝密推算，照目前人口增加速率發展下去，二十年內臺灣人口將增至二千萬人。這一個驚人發展的人口問題所加於臺灣的壓力，已愈來愈大，因此，蔣夢麟博士認為：「問題已經迫得我們非馬上注意和尋求解決不可了。」他呼籲各方面應正視此日益嚴重的問題，共同努力來求解決之方，以減輕這一問題的嚴重性。

蔣博士是在本月十月十三日於專爲此一問題舉行記者招待會時對自由中國新聞界提出此項警告。他希望新聞界本教育社會之責，提醒社會應重視此一問題，從「增加物資生產」和「節制人口生育」來解除此一問題的威脅。

農復會統計臺灣現在每年人口的增加，計淨增卅五萬人，約略相當於位於南臺灣的高雄市的人口，照這一新增人口的基本需要計算，每年所增加的糧食消耗，達五萬二千噸，合新臺幣一億九千元；衣著方面，須增加七千二百萬元；教育方面，增建教室須四億二千萬元，增加教師須一萬人，每年增加薪金支出七千二百萬元。祇就此三項基本需要，每年即達七億五千四百萬元。如果再加上卅五萬人的活動生

存，其消費將更浩大。臺灣地區如此狹小，那裡能無窮盡的每年供給高雄市這樣大的一個生存空間。

農復會復作另一項統計：現在建築中的石門水庫，將來完成後，灌溉所及，年約增加糧食七萬二千公噸，如照每年增加人口卅五萬計算，則每年所增加之糧食消耗五萬二千公噸，將使石門水庫每年所增加的糧食生產，僅足以供新增人口一年零四個月的消耗，石門全部建設經費在六千萬美元以上，需六年時間才能完成，以此耗資耗時，它的艱難成就卻被一年人口的增加中輕輕的抵消了。另外還有一個問題，即臺灣現有的土地，已不足應人口日增的需要。臺灣的農業人口，佔總人口百分之五十強，由卅六年到四十六年，十年間農業人口增加約百分之卅四。但耕地方面，卅六年到四十五年，十年間祇增加百分之五，近三年來，耕地幾沒有變動。以此二項統計作比較，便可清楚的發現臺灣人和土地發展的不平衡狀態。卅六年臺灣每公頃耕地僅負擔八個人生活，到四十五年就要負擔十一個人的生活。每一農戶的平均耕地也由一點五一公頃縮減為一點一五公頃。臺灣的經濟活動人口，在卅六年總人口百分之卅六，到四十五年已跌至百分之卅二。此點說明臺灣在人口激增的趨

勢下，就業已感困難。

至於國民所得和消費方面，亦因人口的急刻膨脹而漸漸的不能平衡增加。臺灣國民消費上升的速率數年來均高於國民所得的增加率。國民消費提高的比率其速度超過生產提高的比率，在短期間內，社會的繁榮尚可維持，但長此下去，因生產與消費失卻平衡，結果生產與消費都會下降，資本不能累積，生產不能繼續增進，而人口不斷增加，生活水準自然會因此而降低。

再從經濟方面看：光復後的臺灣，農工業的發展雖成就很多，但經濟對美援的依賴仍大。臺灣各項經濟建設，需依賴美援協助者佔百分之五十，而進口方面，美援部份亦常佔百分之四十左右，年來均無降低趨勢。因此，臺灣年來經建雖有成就，但因人口的劇增使依賴美援的程度有增無減，且有繼續獲援的必要，這是經濟上的一項不可否認的危機。

臺灣人口的生死率是怎樣呢？據蔣博士的報告：這個海島人口的粗死亡率比較任何進步國家都不算高，但兒童的死亡率卻比任何進步國家高得多。以民國四十四年為例：臺灣四歲以下兒童的死亡數佔全死亡數為百分之四十二，此數較日、美、

英、澳的百分之九點九，七點二，三點二及五點六均高，這說明臺灣的保健衛生尙未達到理想。臺灣每對夫婦平均生育子女爲六人，凡生育子女三人的家庭，其子女的成活率達百分之九十，凡生活子女十人以上的家庭，其成活率即降至百分之六點八，這在人力、生命、資源與經濟各方面，都是一種浪費。因此蔣博士認爲：國民的品質實較國民的數量更爲重要，因而他主張不可祇注重後代的繁育，而忽視子孫的品質，應節育、少產以提高國民的教育、增進國民的健康和改善國民的生活。

蔣博士在討論此一問題中所作的結論說：「自然界本具有各種自然的調節作用，以維持各類生物於某一合理穩定的水平，防止過剩或不足，如果這一區的生物超過這地資源——土地的負擔能力——的一定限度，自然調節便會起來發生作用，如大規模的飢荒、疫病、生物間的自相殘殺等。資源與人口之間也有一定的比例，超過這一限度，生活水準必定降低。如果人口繼續增加，生活水準繼續降低，到了某一限度，也一樣會發生大規模的飢荒和疫病以及自相殘殺。我國二千多年來的歷史裡，真不知有多少這樣的例證。如果我們希望把臺灣造成一個富庶康樂的地方，那我們就要正視此一問題，如果我們自己不能解決自己的問題，自然調節的作用終會

來替我們解決，那將是很不幸的。」

蔣博士在答覆記者所提一項問題時，認為：臺灣人口配合資源的發展，其膨脹速率應為百分之一點五，即每年增加人口十七萬人，始較為適合。他說明世界上部份國家已實施節育工作，而且已獲得良好的結果。臺灣要解除人口劇增的嚴重威脅，那唯有從這一方面去做。他認為現在節育的方法甚多，臺灣有婦女所組織的「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從事此一工作的推動，且已深入臺灣的農村，挨戶勸說。各地衛生機構亦予協助配合，但未見若何收效，主要為各方對此一問題的重要性尙未十分瞭解。他說：節育運動主要在乎男人，如果男人不予協調配合，節育就很難有效，因此他希望先生們不要任情任性，要切切實實和太太們配合，才不會多育兒女。（四月十四日寄）

重質乎？重量乎？

臺灣人口壓力之嚴重，經蔣夢麟博士等人不斷指出而日益爲人注意。但人口畢竟是生產和國力的最大資源，怎樣把握這資源恰到好處，最是值得我們深思，人口實質的力量，應爲人口量與質的乘積。這就是說，要使人口這一力量充實光大，能與現有的技術、資本、組織和其他生產因素保持最理想的關係，量的持續與增大固然重要，而質的提高尤不可緩。因爲，後者所需的成本，遠比前者經濟；而且龐大而質素低落的人口，無寧爲一種浪費。

人口的質包含先天與後天兩個方面，先天上如民族的本質，民族文化與經濟生活對祖先體力智力的影響，以及生物選種遺傳的造因，在在都有關係。在後天，一般生活水準的高低，知識技能培養得充分與不充分，和道德精神的好壞，無不也是質的變化的原因。倘使民族的全體成員，在這些關係與原因上都受著滿意的賜與，這民族人數縱然不多，仍不失爲一個極不可侮的力量。

從生存的意義來講，人類不斷在戰鬥之中；不管是人與人爭抑或人與天爭，全都一樣。這又關涉到一個單純的質的問題。蔣百里先生對民族的發展有過極卓越的

見解：即民族的生活條件與戰鬥條件合一者強，否則弱，戰鬥所需者何？曰強健高越的體力與智力，雄厚的經濟生產和優良的文化傳統。而完美的生活所需者，認真說來還是戰鬥所需的這些條件。必須統一了這兩方面的條件，人口的質始不期高而自高，外足以禦侮圖存，內足以開發自然，求生活精神的向上。我們今日既無法不求存，我們便無法不向這一提高民族力量最經濟的道路上走。東西德總共不過六千萬人口，但德國一直是東西兩大集團爭取的對象，為雙方談判的癥結。無他，日耳曼民族在上述人口本質的諸多原因，具有其堅實的基礎。他們真做到了戰鬥條件和生活條件合一。平時為優秀的生產成員，守份的百姓，戰時又可立變為勇猛的鬥士，捍衛國家，以此為例，不問從經濟使用人口資源來講，或從民族安全、生命充實光輝來講，我們的人口政策，定然要在質的提高上努力。

在質的提高下，倘如因應我們的技術、資本，組織等因素發展而有使人口在量的方面擴大的必要，然後量的加大才算合理。我們並非不知，人口的生殖，不能與機械生產相比。但大家倘能夠瞭解質的發展較諸量的擴充，無論對自己、對家庭乃至社會國家都最經濟最幸福，便不難自動的朝著這方向去做。經由教育知識的提高

，與工業經濟的發展，這目標定可達到。計自馬爾薩斯以來的經驗，一直是知識較低的階層，或農業經濟社會人口的繁衍最快。以一九五一至一九五六年爲例，五年間英法瑞日每國總共不過增加一九五一年的人口百分之二至七。有些平均每年人口增殖還不到分之一。這便是一個極好的證明。

推究我國人口增殖之所以如此之高，大抵有其歷史的、經濟的、責任感的、知識的成因在。歷史的傳統，總以「多子多孫」五代同堂爲佳話，足以稱羨鄉里。而「無後爲大」的意識，更使大家以「多男」與「多福多壽」同爲善頌善禱之詞。在經濟上、我們依然倚農業生產爲根基；都市的人口，不少仍有農業勞作的淵源與習性。農業經濟最大的生產因素既爲勞力。從而多生子女便成了多增加勞力。在繁榮家庭的企求下，人口遂被迫作幾何級數的增加。益以思想較爲保守的父母，對兒女「育」的責任感每每趕不上「生」的企求。將「生」與「育」截然分開。形成只管生而不顧育的現象。至於大家昧於節育的方法，這尤其普遍。凡此無不造成我們日見增長的人口壓力。今天要談阻止這一壓力，似已只有從提高大家的認識和發展工業經濟著手。

我們要特別聲明的，我們並非機械而靜態的馬爾薩斯的信徒。其所以主張重質不重量的人口政策，主要還是一個極現實的經濟考量。從今日的適度人口理論(theory optimum population)來看，在一定的技術、資本、組織與其他因素之下，配合人口某一合理的「質」，必然有一個不可逾越的適度的「量」，才能使生產臻於最高而最有效。過與不及，均不經濟。但，今天我們人口的情形，卻是「量」的過，「質」猶有待於進一步提高。

聯合報 民國四十八年四月廿五日

人口壓力不容忽視

臺灣省政府周至柔主席日前在省議會的施政報告中，指出了臺灣目前人口增加的壓力問題。他說：在去年一年中，本省人口增加了三十四萬九千一百八十五人，人口總數已從四十六年底的九百六十九萬零二百五十人，至四十七年底增加為一千零三萬九千四百卅五人，從今年起，每天之內，幾乎就有一千個一無所有的新生命

，投奔我們這一千萬人之中，向我們索取食物、衣著、醫藥及一切所需。周主席並鄭重指出：人口增加的壓力，正嚴重的威脅著我們建設所得的成果，由此可見人口壓力問題的嚴重了。

臺灣人口壓力問題，先則由蔣夢麟博士提出，最近復經過周主席的沈重報告，凡是關心臺灣未來發展的人士，莫不一致表示焦慮，良以臺灣的領域有限，生產也隨著受自然環境的限制，不可能隨人口的增加而無限度的增加，如果長此下去，將來終有一天，因人口的負擔使我們喘不過氣來，也真說不定我們要遭遇到自然淘汰的悲運，這是一個可怕的結果，我們應該怵目驚心的注意這個問題，並謀所以避免及挽救之道。

減輕人口壓力最有效的辦法，當然是節育了：中國人一貫傳統的觀念，是多子多福，這種觀念的形成，是舊式農業社會中必然的現象，多一個人就多一份生產力量，人多好做事，已成爲舊社會中的一個信念，因而子孫衆多，不但是充滿家庭樂趣的唯一條件，而且是家庭的一大財產。今天是工業社會了，人多並不一定即意味著財富的充裕，相反的，人多反而是家庭的負累，尤其處在今天的臺灣，四面環海

，幅員狹小，即令發揮經濟建設的最大效力，也無法適應人口增加的趨勢，我們生兒養女不僅僅使他們食飽衣暖爲已足，一定要好好的培養教育，使之成爲一個健全有用的人，如果生而不教，豈但是爲社會製造愚民，簡直是父母的一大罪孽。所以無就經濟的教育各項觀點來說，我們不能也不可漫無限制的生產，而把大家的生活拖垮。

節育問題，到現在爲止，只是一部份社會人士的倡導呼籲，政府當局，對這個問題並沒有公開提出來，政府當然有政府的顧慮，這一問題應當有民間來宣傳提倡，尤其要針對廣大的農村，來改變農村社會多子即多福的古老觀念，因而減輕人口壓力，今後應從兩方面去努力，一是發展經濟建設，一是提倡節育，而提倡優生論，更是我們社會領導階層人士今後的一大責任。

千分之三十六

本省人口增殖率，過去的統計，是每年增加千分之三十五，昨據省政府周主席在省議會報告，去年一年中，增殖率已超過千分之三十六。他說：「從今年起，每天幾乎就有一千個一無所有的新生命投奔到我們，向我們索取食物，索取衣著，索取醫藥，索取一切所需。」

此外還有最重要的一點，必須特別指出，就是這千分之卅六，是以幾何級數增加的，很像計算複利的方法，天天堆疊起來。譬如說，去年年底，全省人口總數為一千另四萬人，今年增加三十六萬，那麼今年年底是一千另四十萬人。明年增加之數，並不是三十六萬人，卻是三十七萬四千餘人，後年所增加的，應為三十八萬七千人。

周主席稱此為「人口的嚴重威脅」，甚為恰當。這是我們所遭遇的「嚴重」而「威脅」日益加深的問題。希望有遠見的政治家，從速檢討這個問題。

中央日報 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一日

周主席向省臨議會報告施政

繁榮臺灣準備反攻

必須加強經濟建設

（本報臺中專電）臺灣省臨時省議會昨（三十）日舉行本屆第五次臨時大會，由臺灣省政府主席周至柔報告施政並提出四十八年度省總預算。

周至柔主席告訴省議員稱：總統在元旦文告中昭示我們，今年是反共復國的勝利決定年，中央政策也指示我們：「四十八年最基本的中心工作，為保衛臺灣安全與恢復大陸人民自由所必須的軍事，和增進國家力量與提高國民所得的經濟，其他各項施政，均以配合此中心環節，協調推進，以遠成開拓反共復國機運的目的。周主席說：在這些根本的指導原則下，未來一年中省府所應奮力的首要中心工作，至為明顯，要以更多的努力，開展經濟建設，並使之更具效果。祇有從經濟建設中不斷滋長的繁榮，才能日益滿足全省同胞改善生活的期望，才能支應我們軍事力量的繼續強大，也才能使我們反攻復國勝利，更充份具備決勝的條件。因此，對本省來

說，未來這一年，應是一個進一步開展經濟建設的年度，也是一個促進繁榮滋長的年度。

周氏旋就過去一年的建設情形作一番檢討，其中對於糧食生產、林業、漁業、水利、公路、鐵路、港務、工業、電力以及教育和衛生等方面。周主席告訴省議員稱：由於過去建設的情形，造成了一項事實，那就是使全省同胞國民所得總額，從四十六年的二百九十九億八千二百萬元，走上了四十七年三百一十九億零一百萬元的新高峰。也使國民平均每人所得從四十六年度的二千八百九十三元變成了四十七年度的三千零三十一元。周主席說：這些數字裡面灌溉了我們每一個人的智慧、技能利血汗。

周主席同時告訴省議員說，人口增加的壓力，正嚴重威脅我們建設所得的成果。在去年一年中，本省人口增加了卅四萬九千一百八十五人，現在人口總數，已從四十六年底的九百六十九萬零二百五十人，至四十七年底增加為一千零三萬九千四百卅五人，增殖率超過了百分之卅六。從今年起，每一天之內，幾乎就有一千個一無所有的新生命，投奔到我們這一千萬人之中，向我們索取食物、衣著、醫藥及一

切所需。我們的責任是必須立即滿足他們的需要。

周主席認為，面對著這樣沉重的人口壓力，進而開拓未來的繁榮，祇有加倍努力於經濟建設的開展。這並非就此忽視了其他各項施政，而是要以經濟建設，做為我們施政中心環節，使其他各項施政，都能配合這個中心環節，得到協調的推進。

聯合報 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一日

嚴重的臺灣人口問題

響應蔣夢麟博士的呼籲

中國農村復興委員會主任蔣夢麟氏近在記者招待會提出臺灣人口問題。他說：「臺灣現有人口一千萬，每年正以三·五%的增加率在增加，亦即每年淨增三十五萬人，約略等於一個高雄市現在的人口」。他且指出：「如以現在的出生率推算，臺灣的人口十年以後，即將達一千五百萬人；不出二十年就會增加一倍」。而在供應方面，蔣氏以為這樣人口的增加，每年消費一個石門水庫所能增產的糧食，所以

爲資源與人口的合理平衡，除了儘量設法增加生產之外，應該節制生育，他以重視此一事，曾對記者如是說：「我現在要積極地提倡節育運動，我已要求政府不要干涉我，如果一旦因我提倡這運動而闖下亂子，我寧願政府來殺我的頭」，以示決心。（四月十四日臺北各報）。

回憶四十五年九月十二日，我曾在「自由人」五七七期發表「臺灣的計劃家庭問題」一文，作了類似的呼籲，並希望當時立法院對此項問題提出質詢，以促政府採取行動，到了當年十月十六日，自立晚報刊出一段新聞：「行政院長俞鴻鈞今日上午在立法院答覆立委何景寮質詢有關人口政策問題時稱：本省人口歷年激增，已到達過去的一倍，惟政府對於人口政策，並不提倡節育，而係就增加生產爲其著眼點，俞院長並強調表示解決本省人口問題，最根本最主要的途徑，還是早日反攻大陸」。觀乎此，可知政府既認識人口的激增，但不主張節制，只著眼於增加生產；而且，以反攻大陸爲根本解決之道。實際上，反攻大陸，並不就可改變人口的增加率，而增加生產是否足以適應人口增加的需要，才是問題的所在。

兩年後沒有出口了

這一點，我們可在蔣氏同時發表底「讓我們面對日益迫切的臺灣人口問題」一文中，獲得領會。就每年淨增三十五萬人言，育、教、衣、三項，每年估計就需要新臺幣七億五千四百萬元；說到糧食，以經費六千萬美元而需時六年底石門水庫，可增產糧食七萬二千公噸，就每年所需要五萬二千公噸，僅一年零四個月的人口就抵銷了。且臺灣耕地有限，三十六年每公頃耕地負擔八個人的生活，四十五年增加到十一人；再展望今後農業的生產，就依每年增產五%推算，到民國五十年則夠臺灣人口消費，無可出口，再後就不足了。至於利用各種新技術，以提高單位面積的產量，究不能逃出土地報酬漸低律的支配，且一切增產的措施，又都需要很多財力。

抑有進者，蔣氏指出臺灣國民所得由民國四十一年至四十六增加四三%，由於人口迅速增加的關係，個人所得才增加二〇%，另一方面，消費在同期間卻增加了六六%，少的三四%係由於人口增加所致（六六%因提高生活水準）。而這一國民所得及消費的提高，過去農工業的生產計劃，一半依靠美援的資助；而物資的進口，四〇%左右亦有賴於美援的支持，並非我們自己的力量所能招致。況且，「一個

地區的年生產量，除供該地人口消費外，應當還有相當數量的剩餘，以爲儲蓄及投資之用。：：如其生產盡耗於日常生活，則一旦意外或荒歉來臨，其境遇將非常危險。：：所以我們必須及時面對問題，否則時間愈久，解決愈難。」

要注重子孫品質

基於此，可知單增加生產，並不足以適應人口增加的需要。且蔣氏有言：「資源與人口之間也有一定比例，超過這一限度，生活水準必定降低：：如果我們希望把臺灣造成一個富庶康樂的地方，那我們必須正視這個問題。」蔣氏進而研究臺灣死亡率，他以臺灣的粗死亡率雖不高過先進國家，但兒童的死亡率卻高於任何進步國家。臺灣每對夫婦平均生育子女六人，生育三人以下底家庭，其子女的成活率達九〇%，十人以上者則降至六八%，實在是人力、生命、資源與經濟的一種浪費。他看到我國多數國民似乎只注重後代的繁殖，較少重視子孫的品質，殊不足以適應現代底社會。

非節育無以維生計

本年一月六日，我看到聯合國發表人口報告：以世界人口到本世紀末將超過六

十億人多於現在數目的一倍。據估計：世界人口到一九六二年將達三十億人，一九九〇年五十億人；一九五七至一九五八年，世界人口增加九千萬人，約等於一個日本或兩個法國的人口，一九五〇年，世界人口的一半以上（五〇・一〇%）集中於加勒比海及亞洲（日本在外）諸國，二〇〇〇年將達三十五億六千萬人（五六・八%）。一九七五年，北美、溫帶南美、日本、歐洲、蘇俄、澳洲及新西蘭的人口估計將達十一億七千五百萬人，二〇〇〇年將為十五億人；同期間，非洲、中美、熱帶南美、亞洲（日本蘇俄在外）、太平洋島嶼（澳洲及新西蘭在外），將由二十六億六千萬人增加到四十八億人。前者屬於先進國家，後者是落後國，亦即受到人口壓迫地區；由此我們體會到後者非節制人口的增加，將難以維持生計。

我又看到亞洲的日本，其所以人口問題獨立於亞洲之外，則採取人口節制之故。日本的出生率，一九三六—三九年在三%以上，現在降到一・八%；十五至二十年內，她希望達到西歐的低出生與死亡率水準。日本出生率的降低，蓋由其致力於節制生育；她於一九四八年立法准許墮胎，自此她的出生率由三・三七%下降至一・九四%（一九五六年）。雖然如此，她尚有六十萬人以上完全失業，無數人僅能

得部份工作；而在農村方面，且到處存在著隱藏失業。

落後地區的嚴重挑戰

明乎此，人口的壓迫，為落後地區所面臨底一個冷酷挑戰，日本領先採取對策且已收效；我們為什麼不為我們自己及後代作及時底打算，而坐令命運作無情底支配？印度年來正努力於經濟計劃的推行，但其效果為人口增加所抵銷，不也是實例嗎？陳兼院長於本年二月二十日曾對立法院指出「在政治、軍事、經濟與社會文化各方面必須有勇氣面對問題：：決不可推拖敷衍，使可解決的問題變成不可解決的問題」；我謹在蔣氏登高一呼之下，再度提出此一問題，以求朝野共同對人口政策加以確立。而在政府未採取行動之前，我贊成蔣氏先對「中國家庭計劃協會」工作加以擴大，以成爲一種社會運動。

所謂「計劃家庭」(Planned Parenthood)就是一個家庭單位，就它可能養育子女的經濟能力，或母親基於健康的關係，而限制它的子女數目；其法乃以避孕及墮胎雙邊地控制出生率，另一方面，某一家庭缺乏子女時，且可由醫術的協助而使其達到目的。在傳統觀念之下，此舉將不免視爲反常；惟爲幸福的遠景著想，我們

應當有勇氣進入一條新闢的大道（四月廿二日）

一五四

香港自由人報 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二日

看臺灣人口問題

自從農復會主任委員蔣夢麟先生發表有關臺灣人口問題並提出「讓我們面對日益迫切的臺灣人口問題」一文之後，臺灣人口問題又重新引起人們的注意。其實這一問題並非突然而來，至少是從光復以後便一直存在的一個問題，其嚴重性從未減輕，而且日益加重。不過人們多半只注意眼前問題，不注意根本問題，這一關係臺灣經濟根本的問題被人忽視了。

有了問題，我們不看固不對，誇大問題也不必，對人口問題，我們不應盲目的樂觀，也不應宿命的悲觀，我們我面對冷酷的事實（四月十九日本報社論曾以此為題），提出有步驟的對策，所謂有步驟的對策，就是說對人口問題，沒有任何對策可以激底解決，或者一勞永逸的解決，必須逐步漸進，制定長期的人口政策。

首先，我們必須對臺灣人口問題有一正確認識，有了正確認識，次一步才能談提什麼對策，猶如治病須先診斷，然後下藥一樣。不可諱言的，到今天為止，臺灣的人口統計，還是不夠完備的；我們根據不完備的統計，所下的結論，自然不會正確可靠的。所以第一步，我們還須加強研究人口問題。從深入的研究中，找出問題的真相，再及其他。比方，大家據以推斷未來人口增加的自然增加率，百分之三·五，便是一個沒有十分把握的百分數，需要加以分析加以修正。

臺灣的人口統計是由人口登記來的。民國四十五年九月十六日的人口普查，全部統計尚未發表，距前次的普查，相隔十六年，到現在將近二十年了。在這期間，一切人口統計都是根據戶口登記算出來的。臺灣的戶政辦理得極好，在這方面費的人力也最大。就戶口登記的基本單位鄉鎮公所說，差不多三分之一至五分之二的人員都用在戶政上。因之，對於各項的動態登記，諸如出生、死亡、結婚、遷徙等等，都相當完備，而戶籍檔案之整理保管，尤足稱道。不過有一點我們要注意，戶政機關辦理戶口登記，目的在戶政，不在人口統計，由省政府的民政廳起，到各縣市及各區鄉鎮，均無專門辦理人口統計的機構和人員。我們現在所得到的人口統計，

都是戶政的副產品。這樣，沒有人口機構和人口專家所得來的人口統計，其可靠性當然是有限度的了。

農復會與省政府主管當局鑒於上述的情況，特於去年擬定一項改進人口統計實驗計劃，指定桃園縣桃園鎮，苗栗縣後龍鎮，台中縣清水鎮，雲林縣斗六鎮，臺南縣新市鄉五處作爲實驗區。此項實驗至目前爲止，已實行了十個月，由這十個月的實驗，已發現很多新的事實。最重要的事實，就是我們的人口登記申報不完備，因之據以計算的出生率，死亡率，和自然增加率，也就都不完備了。這五個地方還不能說有完全代表性，十個月的時間也太短，但由於此種初步實驗的結果，我們發現出生死亡都有漏報。以苗栗縣之後龍鎮言，全鎮共有人口三九·六七五人，大半爲漁民，自四十二年實行漁民保險之後，漁民嬰兒出生死亡均有補助，故漏報極少。但該鎮實行改進辦法十月以來，亦發現死產匿報六十九件，出生死亡匿報七十件。該鎮人口不及四萬，且大半有漁民保險，漏報尙如此之多，其他鄉鎮可想而知了。這一事實說明：在出生不久即告死亡的嬰兒，既不報出生，亦不報死亡，對總人口數或無甚大影響，但出生率，死亡率，及自然增加率，則大有出入。每千人出生者

人數多，每千人死亡者人數少，故匿報出生死亡人數相等，對出生率影響小，對死亡率影響大，勢必將自然增加率提高。因之據以推測每年增加三十五萬的人口，將失之過鉅。這種是一例，其他重要人口分析，均不免發生偏差。由上述的一例，我們可以知道，臺灣的人口問題，尚須進一步研究；有了較澈底的研究，才能把握問題的真相，才能作較為可靠的人口預測，進一步才能提出問題的對策。這可說是處理臺灣人口問題的第一個步驟。其次由於問題的研究可以引起當局和社會人士的注意。使大家正視這一問題，不要對這一嚴重的根本問題視若無睹，置若罔聞。再次是以研究所得的冷酷事實，公之於世，使大家了解問題，改變傳統的人口觀念，知道少生子女是幸福，是進步，是文明。少生幾個子女不影響我們的勞動潛力，更不影響我們的國防力量。第四是要大家曉得避孕不是不道德的事，進一步普遍宣傳避孕的方法和遲婚好處，如可能學習先進國家的先例，把避孕列為公共衛生設施，則收效當更大了。至於墮胎定為合法，可能還需要若干年的努力，始能訂為成文法律。好在避孕若收實效，墮胎就無問題了。最後，最重要的還是要有一套人口政策。所謂政策當然是指政府措施而言。政府不動，很難收全面之效。目前世界上二十七

億人口中，有將近一半的人口在政府的人口政策之下求改進。如果我們再以陳舊的傳統，落伍的觀念，視爲教條，我們的命運，就將如馬爾薩斯所說，真正陷於悲慘之境了。

徵信新聞 民國四十八年五月三日

PRESS COMMENTS
ON
THE POPULATION PROBLEM IN TAIWAN

C O N T E N T S

Dr. Chiang Warns of Population Menace, Urges Birth Control.....	1
350,000 Babies Yearly Give Taiwan Explosive Food, Population Crisis.....	4
Population Pressure.....	6
Taiwan's Population Problem.....	9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The Need For Protecting Farm Land.....	11
On Birth Control.....	13
Birth Control and Contraception.....	14
Doctors' Views on Birth Control.....	16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17
Birth Control.....	18
Traditional Ideas Versus Cold Facts.....	19
The More Are Born, The More Die.....	24
Governor Chow Reports to the Provisional Provincial Assembly.....	26

Editor's Note

This pamphlet contains editorials and leaderettes culled from Chinese and English-language newspapers in Taiwan in the one-month period (April 13-May 12, 1959) since Dr. Chiang Monlin made on April 13 his historic call on the people of Taiwan boldly to face the serious problem of population pressure on this island. The reader will at once see that there is a unanimity of opinion on this question rarely witnessed in connection with other social problems.

PRESS COMMENTS
ON
THE POPULATION PROBLEM IN TAIWAN

DR. CHIANG WARNS OF POPULATION MENACE,
URGES BIRTH CONTROL

Taiwan now faces an "imminent menace" of overpopulation. Some 350,000 babies, equivalent to the population of Kaohsiung City, are born every year, said Dr. Chiang Monlin yesterday.

It takes at least NT\$754,000,000 (about one third of the total Tapi issue) to feed, educate and clothe the new babies every year, said the chairman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Projected increase of 72,000 metric tons of rice by the Shihmen Reservoir, which it will take six years and US\$-60,000,000 to complete, will be eaten up by the new portion of the population in exactly 16 months, Dr. Chiang said.

Taiwan's population, which exceeded the 10,000,000 mark at the end of 1958, will reach 15,000,000 in ten years and double in 20 years, Dr. Chiang calculated.

Such is the serious situation of the threat of overpopulation in Taiwan that something must be done and done quickly, said the 74-year-old educator-administrator. As a solution, he suggested birth control and planned parenthood.

"A few years ago," he said, "I thought we would have

no population problem so long as we keep on stepping up food production. But now I have realized food production increase alone will not solve the problem unless it is matched by population control."

At the present pace of food production increase, Taiwan will still have enough food to feed the people in 1961, he said. From then on, food production will lag behind the population growth unless 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s accelerated, Dr. Chiang said.

"Facing this grim prospect," Dr. Chiang said, "we are making utmost efforts to forestall the danger of food shortage." He mentioned a number of projects to increase food production, but adding, "all these take time and can be achieved only with great efforts and huge sums of money. The Shihmen Dam is an example."

He cited figures to illustrate the heavy burden imposed on the national finances by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saying: To feed and raise the additional 350,000 children on the island, we must have the following:

1. 52,000 metric tons of rice, estimated on the basis of 150 kilograms of rice for each person each year. Estimated at NT\$2.20 per Taiwan catty, the total amounts to NT\$190,000,000.
2. 7,000 new class rooms built at a total cost of NT\$420,000,000. Each class accommodates 50 children. Averaging one and a half teachers for each class, 10,000 teachers are needed. The salaries of the teachers, estimated at NT\$7,200 per teacher per year, amount to NT\$72,000,000.
3. NT\$72,000,000 for clothing, estimated at NT\$200 for each person.

The grand total for these basic necessities alone is NT\$754,000,000 every year, he said.

From 1947 to 1956, he said, the total acreage of arable land on Taiwan increased from 830,000 to 870,000 hectares. But because of the fast population growth, the average cultivated area of a farm household dropped from 1.51 to 1.15 hectares, Dr. Chiang reported. In 1947, eight persons lived on a hectare of land. By 1956, the same piece of land must produce enough to feed 11 persons.

The total national income, estimated by the government with due allowance for currency depreciation, increased by 42% during the 1952-1957 period, he said. Due to the population increase, however, the per capita income was increased by only 20%. On the other hand, national consumption rose by 66% in the same period.

The mortality rate of Taiwan's population is comparable with that of most advanced countries, he said. But the infant death rate on the island is much higher—42% according to 1955 statistics—as compared with 9.9% for Japan, 7.2% for the United States, 3.2% for Britain, and 5.6% for Australia.

In conclusion, he said: "Excessive fertility is not merely a theoretical problem we are facing, but a practical situation out of which we must find a way. If we fail to do so, the alternative will be Nature's own readjustment" by means of famine, epidemics, and mutual elimination.

—China News, April 14, 1959

350,000 BABIES YEARLY GIVE TAIWAN EXPLOSIVE FOOD, POPULATION CRISIS

NT\$754 MILLION IS ANNUAL BILL, SAYS DR. CHIANG MONLIN

The 350,000 babies born every year in Taiwan are costing a total of NT\$754,000,000 a year to feed, clothe, and educate them.

Astounding as it may sound, this is the cold fact supported by statistics and reported by Dr. Chiang Monlin, Chairman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at a press conference yesterday afternoon.

With the warning that the "excessive fertility" is "a problem we must face and solve today," Dr. Chiang predicted that the population in Taiwan will be increased by 100 percent in 20 years. He added that the estimate he made in 1951 that Taiwan's population would reach 10 million by 1965 was realized seven years ahead as a result of the vast improvement in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upply in the past eight years. "It is possible," he said, "further decrease in the mortality rate in the next 20 years may make the present estimate useless."

To demonstrate how costly the population increase would be, Dr. Chiang reported that 52,000 metric tons of rice, 7,000 new classrooms, 10,000 additional teachers and NT\$72,000,000 worth of clothing would be required every year to feed, educate and clothe the 350,000 babies born in every 12 months on the island. The gigantic Shihmen Dam project, which will involve a total expense of US\$60,000,000 and take six years to complete will only result in the increase of food production of 72,000 metric tons a year, Dr. Chiang said. But this increase of food

production, he added, will only suffice the consumption of the annual population increase for 16 months.

In addition to the food problem, the JCRR Chairman pointed out, there is the serious problem of finding enough living space for the increased population. During the 10 years from 1947 to 1956, he said, the increase of farm population was about 30 percent while that of acreage of arable land was only five percent. In 1947, he added, eight persons lived on a hectare of land. By 1956, he pointed out, the same piece of land must produce enough to feed 11 persons. Under the pressur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job opportunities had also been reduced from 38 percent of the total population engaged in economic activities in 1947 to 32 percent by 1956, Dr. Chiang said.

While about 50 percent of Free China's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projects are supported by American aid or the Counterpart Fund, the nation's economy is still relying heavily upon U.S. economic aid becaus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despite the headway made in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through the successful implementation of the two four-year economic plans, "The seriousness of this threat to our economy," Dr. Chiang stressed, "cannot be overstressed."

Despite the fact that Free China is now a rice exporting country, Dr. Chiang told the newsmen, there will be no excessive food on the island by 1970. From that time on, he said, the farm production will be progressively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need of a growing population. The only thing to do is to make the limited cultivated land produce more but all the possible efforts would take time and can only be achieved with great efforts and huge

sums of money. The Shihmen Dam is an example, he said.

Excessive fertility, Dr. Chiang said, is not merely a theoretical problem but also a practical situation out of which we must find a way. If we fail to do so, he concluded, the alternative will be Nature's own readjustment by means of famine, epidemics and mutual killing.

—China Post, April 14, 1959

POPULATION PRESSURE

We agree with Dr. Chiang Monlin, Chairman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on the necessity of launching a birth control campaign in Taiwan, which he suggested in a press conference held last Monday, in order to relieve the island of population pressure. The rapid growth of population, which is nowadays more liable to bring about economic disasters in most countries than public wellbeing, is leading to some very serious consequences here in Taiwan.

One problem confronting the island is that when the population increases at a much greater rate than the area of arable land and per unit area farm output, the island will have no surplus rice to export as it does now after two years, as the veteran educator estimated, but will be faced with food shortage thereafter. Then not only the country will be deprived of a big source of foreign exchange, but also the insufficient supply of foodstuffs will make it difficult to keep the prices stable in view of the fact that food prices always carry exceptionally great weight in the price structure of the island. The present

efforts made by the government as well as the US aid authorities for raising the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eople will be also largely, if not entirely, frustrated when the consumption of the country shows much faster increase than its production. The traditional conception that agricultural economy is more capable of containing surplus population is only true when the standards of living of the rural people is relatively low. A rapi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without a corresponding boost of production means inevitably more miserable life for the people. It is not very seldom on the island that a middle-aged couple have already half a dozen of kids to feed and continue to give birth to a child yearly, yet their earning power shows no increase. Their livelihood, in such circumstances, is bound to deteriorate and their children can hardly be well fed and educated. This will pose a great deterrent to the progress of the nation physically and intellectually.

The unemployment problem, which is already embarrassing on the island, will become almost insolvable if the rate of increase in population keeps unabated and we will soon face a dilemma in making policy decisions. As mechanization of farm production and automation of industrial equipment, which are constantly urged by various quarters and are on the way to realization, will save a great deal of human labor, on the one hand, and there is an increasingly large surplus labor force resulting from the rapid population growth awaiting employment, on the other, it would rather be difficult to map out a policy that can meet both ends. While primitive methods of production can have relatively more workers in employ and it is often for this reason such methods are being still used in certain types of production, modern equipment

and methods can bring about higher efficiency in production, and increase in efficiency is of utmost importance at the present stag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The magnitude of labor force is no longer a decisive factor of any nation's economic strength, but rather surplus labor force gives rise to serious social problems which often imposes a great burden on the economy.

Nor is manpower considered as important as before in building up a nation's defense strength. Instead, huge sizes of armed forces may lead to economic and financial strains. With the continuous invention of new weapons which can increase the firepower of troops immensely, strategical conception has undergone a drastic change to favor crack units with greater firepower. The human-wave tactics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proved much less effective in Korea than on the mainland when the Reds used it in their rebellious war against the government. Thus, the dramatic announcement of census statistics made by the Peiping regime a few years ago, which put the population on the mainland at over 600 million, an increase of about 150 million over the census statistics compiled immediately before Communist take-over, and was, understandably, designed as an intimidation to the free world, has now become an indicator of an economic weakness of Red China, providing economists with materials to diagnose its economic ills. The crushing financial burden imposed on its economy by the tremendous military expenditures is especially considered as a contributing factor in the early collapse of the puppet Peiping regime. The time of evaluating a nation's strength by the size of manpower has passed, and a rapid increase in population is more likely to do evil than good to a

nation's economy. The knowledge of birth control is beneficial both to individuals and the country, and it is deemed appropriate to have it introduced to the public.

—China Post, April 17, 1959

TAIWAN'S POPULATION PROBLEM

The warning sounded by Dr. Chiang Monlin, chairman of the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against what he called "the looming specter of overpopulation" on Taiwan should be taken seriously not only by the government but also by the people in general.

To quote Dr. Chiang, "the threat of excessive fertility, therefore, is not something we should deal with in the future. It is a problem which we must face and solve today."

Taiwan's present population of 10 million is increasing at a rate of 3.5 per cent a year. This means every year there will be 350,000 more mouths to feed. If this rate keeps up, Taiwan's population will be doubled twenty years from now, if not actually sooner because of continuous improvements in public health and medical services.

Against this pressure of increasing population, there was only a five per cent increase in the acreage of arable land on the island between 1947 and 1956. Furthermore, there has been no change on this score during the past three years. A determining factor is that Taiwan, being two-thirds mountainous, offers only limited possibilities for expansion.

Another important fact cited by Dr. Chiang is that though Taiwan's total national income increased by 42 per cent between 1952 and 1957, becaus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the per capita income only showed a 20 per cent increase. Yet during the same period, the national consumption was increased by 66 per cent.

Dr. Chiang has rightly pointed out that this unbalanced situation of more national consumption against less total national income could only last for a short period of time without affecting Taiwan's prosperity and standard of living.

Some people here a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aiwan's population problem would be solved the moment the Chinese mainland is recovered. What they have overlooked is that the same population problem will still be with us then, except that on a much larger scale. Mainland recovery, therefore, will only put off but not solve the problem.

Industrialization Helps

Others see in Taiwan's further industrialization a possible way out for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They point to countries like England and Japan, neither of which is producing enough to feed the local population and yet both of which, by exporting manufactured goods and services and importing food, are maintaining a high standard of living. This is true, but what is lost sight of is that these two countries have a national income which is much larger than their national consumption, thus leaving a sizeable balance for investment. In the case of England, there has been no significant population increase in years.

A third group claims that there is a loophole in Dr. Chiang's emphasis on agricultural production versus population increase. Very few countries in the world, it is asserted, produce enough to feed their own people. What is wrong with exporting goods and services and importing food supplies such as what England and Japan are doing? Self-sufficiency, people of this view maintain, is old-fashioned after all.

Vicious Cycle

Industrialization, however, needs to be financed by national income in the long run. In Taiwan's case, a major portion of the national income is being eaten up by the 350,000 new babies that are born every year. There is little left for investment in industrial expansion projects.

Thus, the whole thing presents a vicious cycle, which needs to be broken at some point, and the logical place to break it is firstly by launching a birth control program that is backed up by the government and the general public in order to keep Taiwan's population problem within more manageable proportions. The alternative would be a drop in Taiwan's standard of living with all its consequences.

—China News, April, 20, 1959

POPULATION INCREASE AND THE NEED FOR PROTECTING FARM LAND

General concern has been expressed by various quarters after Dr. Chiang Monlin's initial speech on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and his call for birth control. Surrounded as it is on all sides by seas, it is obviously impossible

for Taiwan to feed an ever increasing population. In view of such a serious situation, it is necessary not only to advocate but also to practise birth control. There can be no doubt about the seriousness of the question with which we are being confronted.

Another urgent problem which accompanies the problem of population has to do with the proper utilization and reclamation of land in this province. We must concede that both Government and the people have done their best in connection with the proper utilization and reclamation of land. Many regions where wild grass and shrubs used to grow have now been turned into plantations for the growth of bananas, tea trees, and citronella. Many sea beaches which used to be washed by oncoming and ebbing tides have now become fish ponds, salt fields, or cultivated land. As a result of earnest efforts in the utilization and reclamation of land, the total annual produce of Taiwan has greatly increased in recent years. We may well be proud of the victory which we have won over the forces of nature.

On the other hand,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though the question of food supply for this island may have been successfully solved for the time being, the insular position of Taiwan places a definite limit to all our efforts and, in the long run, the day will come when the limited land space will be insufficient to meet the needs of the increased population. In order to lessen the seriousness of the population and food problems, we must take simultaneous measures for the proper utilization and reclamation of land, on the one hand, and the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bout birth control, on the other.

One of the most urgent problems to which popular

attention must be drawn is how to protect farm land from being encroached upon. Though some land has been reclaimed in recent years, the acreage of farm land that has been diverted to other uses is surprisingly large. As nature has placed a limit to the amount of land that may be newly opened up, we must protect our farm land from being put to uses other than farming. It is true that the problem of housing is equally important, but hilly and waste lands must be used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ouses rather than farm land.

In order to solve this problem, the Government must have an over-all plan, in which areas for the construction of houses are clearly marked out. At the same time, measures for the protection of farm land should be worked out and strictly enforced.

— From the *Min Tsu Evening News*, April 15, 1959

ON BIRTH CONTROL

Since Dr. Chiang Monlin's call for birth control, many people have expressed their opinions on this question. The opinions thus expressed are mostly in favor of birth control in principle.

It is to be noted, however, that nine-tenths of those who are in favor of birth control are intellectuals, and that they not only favor it in principle, but also have put it into practice for many years.

In the last analysis the question is one which concerns the broad masses of people at a lower intellectual level who are more traditionally minded rather than

the intellectuals. It is well known tha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the Chinese people have thought of families surrounded with large numbers of children and grandchildren as more blessed than those with no or only a few children. We must concede that such ideas still dominate the minds of the great majority of farmers and workers.

Consequently, if we are to launch a campaign for birth control in Taiwan, that campaign should be directed against the farmers and workers rather than against any other group of people.

In short, we are inclined to think that the farmers and workers need to have knowledge of birth control more than the intellectuals, and that the campaign for birth control should be carried out more intensively in the villages than in the cities.

—From the Hsin Sheng Pao, April 18, 1959

BIRTH CONTROL AND CONTRACEPTION

The increase of population in Taiwan has received widespread attention. According to Dr. Chiang Monlin, if the present annual rate of increase of 35 per 1,000 is kept up, the population of this province would be 15 million in ten years and 20 million in 20 years. Such a tremendous increase would seriously hamper the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and create ever more social problems. Hence some suitable degree of birth control is evidently necessary.

Dr. Wei Ping-yao, deputy director of the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thinks that the rate of population in-

crease in Taiwan is terribly high. According to his estimate, of the ten million people in Taiwan over 60 per cent are boys and girls below 20 years of age and unmarried men and women. By subtracting old married couples who can no longer bear children, there is left less than 40 per cent of people in the full vigor of life to whom is assigned the task of bearing children. Dr. Wei said that the four million married people who can bear children give birth to 400,000 babies every year. Dr. Chiang Monlin has also pointed out that every couple in a farming family in Taiwan has six children on the average. This figure far surpasses the average number of children born by an American or European married couple.

Dr. Wei Ping-yao and Dr. Chiu Shih-yung, deputy directors of the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and Dr. Hsu Chien-tien, deputy director of the Provincial Taipei Hospital, all agree that from a purely medical point of view birth control is necessary.

Though all three doctors agree on the necessity for birth control, they do not like people to practice birth control without taking many relevant factors into consideration. They would like to see the organization of some association such as the Family Planning Association organized by Mrs. Margaret Sanger in London in 1939. Such an association would begin by studying the general social conditions, standards of living, the expenses for raising a baby, and similar problems. When all these aspects of the question have been carefully studied, the association would draw up an objective standard to be publicly announced so that the people might decide for themselves whether they would practise birth control in the light of the association's findings and their own finan-

cial status and other relevant considerations. Any persons who decide to practise birth control would be given proper advice by the association on the basis of their financial position and other conditions.

—From the Central Daily News, April 18, 1959

DOCTORS' VIEWS ON BIRTH CONTROL

Since the publication of Dr. Chiang Monlin's article on birth control, public interest in this question has been aroused. In order to obtain the views of medical practitioners on this important subject, we had separate interviews the other day with three members of the medical profession, namely, Dr. Chiu Shih-yung, Deputy Director of the Taiwan University Hospital, Dr. Wei Ping-yao, Deputy Director and concurrently chief of the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department of the same hospital, and Dr. Hsu Chien-tien, Deputy Director and concurrently chief of the gynecology and obstetrics department of the Provincial Taipei Hospital.

All three medical leaders we have interviewed agree that the campaign for birth control advocated by Dr. Chiang Monlin, Chairman of the Chinese-American Joint Commission on Rural Reconstruction, is the right approach to the subject as compared to the time-honored method of abortion which has been adopted by some people even up to the present. The three doctors say that if we do not want any more children, we must prevent their coming in the first instance; and that if we can not prevent it, we must allow them to come into this world. This is a question of morals. It is also the duty of every married

person.

The three medical doctors pointed out that birth control should not be practised indiscriminately, but should be determined by the family's economic situation, the health of the woman concerned, and her social position. This kind of family planning is being practised by most American families. They do this, because they are conscious of the fact that the birth of a baby marks only the beginning of the parents' responsibilities which consist in carefully bringing up the child to be a useful member of society.

The traditional Chinese ideas that it is an unfilial act to have no sons and that to have a large flock of sons and grandsons in the family is one of the greatest blessings of life must be uprooted before we can talk about birth control. In addition, we must have some sort of organization such as the Americans have to give expert advice on birth control and how to have babies. Only in this way can birth control become an effective movement.

—From the *China Daily News*, April 18, 1959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Dr. Chiang Monlin laid his fingers on a sore spot that is plaguing Taiwan today when he emphasized in a recent speech on the necessity for birth control in view of the increasing population pressure on this island.

The question is that birth control cannot be easily carried out. Let us take India as an example. In spite of years of campaigning for birth control by Mrs. Margaret

Sanger, the birth rate of poor people in India is still the highest in the world. Any campaign for birth control is difficult to be carried out successfully, if the general cultural level and living standards of the people remain low. In the case of China, large numbers of children are usually found in families of fishermen, tenant farmers, and coolies. Why? Because those people are poor and ignorant.

In principle we are in favor of birth control, because if you have many sons and daughters and cannot educate them properly, you are simply adding to the burden of society. In that case, you cannot very well expect the country to make much progress.

—From the *Central Daily News*, April 21, 1959

BIRTH CONTROL

In advocating birth control, Dr. Chiang Monlin said that the campaign should be launched by civic bodies. We consider this to be a good idea, because it shows that we pay full respect to the people's basic rights and that we know how to promote popular welfare by scientific means. But how shall we proceed?

To impart knowledge about birth control to the people is not so simple as it may sound. There are really two aspects of the question involved. One has to do with knowledge about birth control before conception, and the other with knowledge about the best way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after conception. One way to impart knowledge about birth control is to compile a pamphlet and give a copy of it to every newly married couple. As to how to

deal with the situation after conception, that is a much more difficult task. But in any event, the question is one of scientific education. From prevention to trying to make amends after conception, all instruments and techniques to be used must be strictly scientific.

It is quite possible that in the midst of our campaign for birth control certain publications of a questionable character which appeal to the sexual instinct of the reader rather than impart to him scientific knowledge about birth control may soon appear on the market. It is also quite likely that aphrodisiacs under the guise of "medicine for birth control" may soon be offered for sale.

—From the China Daily News, April 20, 1959

TRADITIONAL IDEAS VERSUS COLD FACTS

To limit any further increase of our population in Taiwan has become inevitable, and the methods to be used towards that end must include the legalization of abortion and the open dissemination of knowledge about birth control by qualified medical practitioners.

We have come to this conclusion only after carefully weighing all the arguments both for and against birth control, arguments in which some of our most cherished traditional ideas are pitted against the cold realities of increasing population pressure.

The most effective methods to relieve population pressure are two. First, abortion must be regarded as a legalized medical operation for all persons. Secondly, qualified personnel must be permitted openly to impart knowledge

about birth control in educational institutions and other public places.

To put these methods into practice requires firm determination on the part of both government and people, for such ideas run directly counter to our traditional conception that to have a large number of sons is one of the greatest blessings of life. We are sure that loud voices of opposition will be raised against our proposals. Let us first of all examine what the opposition has to say and then see how those arguments should be answered.

First, our opponents might say that since our eventual counterattack against the Communist-occupied mainland would call for immense manpower which the present population of Taiwan cannot supply, how could we ever do anything to hinder its natural growth?

In answer to this argument it must be pointed out that our eventual counterattack against the Communist-occupied mainland does not have to depend upon our ability to match man for man in our struggle with the Chinese Communist regime. It is quite obvious that the population of Taiwan can never by any stretch of imagination catch up with the teeming millions who inhabit the Chinese mainland. The best guarantee for our success in our anti-Communist struggle is twofold: (1) the certainty of anti-Communist uprisings by our brethren on the mainland and (2) our firm determination to build up Taiwan into a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unity. That our brethren on the mainland will rise up against their Communist oppressors is a foregone conclusion. But in order to build up Taiwan into a free and prosperous community it is necessary to develop our economy still further. In order to develop our economy still further, we must

exert greater efforts for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the achievement of a higher degree of industrialization. As capital accumulation and industrialization are scarcely compatible with an ever mounting population, those who argue in favor of an uncontrolled population increase would seem to have failed to make their point.

Another point is worth remembering. The national strength of a modern State does not depend upon the size of its population, but rather upon its total economic potentialities. Before World War II India had a population of 300 million, but it was subject to the rule of Britain with only 40 million people. Indonesia had 70 million people ruled over by Holland with a population of less than 10 million. What we wish to have is the highest degree of economic development rather than a big population concentrated on this island. In order to ensure the full development of our economy, we must immediately reduce the current rate of population increase.

A second argument which our opponents might possibly advance against our advocacy of birth control is that all increase in our population could be offset by emigration and, therefore, could not have any adverse effect on domestic economy.

Our answer to this argument is this. In the first place, there has never been any country in all history that has resorted to emigration as the principal means to reduce its population. Even in the centuries when the British were emigrating in large numbers to North America, Australia, New Zealand, and other places of the world, the population in Britain itself still kept on increasing.

Secondly, there is no place in the world which can

permit such a great number of Chinese emigrants to settle in it as to relieve our own population pressure at home. The South Sea areas are already closed to our emigrants, not to say North America and Australia. The density of population in Europe is well known so that there is no room for Chinese emigrants there. Where shall we send our surplus population? At most we might be able to send out a few thousand in a year, but that does not help much. We are not opposed to emigration as such, but we refuse to believe that emigration can be the chief means to relieve our population pressure.

A third reason that might be offered to oppose our proposals is that to permit abortion would lead to the corruption of good customs and manners and help promote abnormal sexual relations.

We do not deny that after the legalization of abortion many persons who maintained abnormal sexual relations with others might find it easier to erase all traces of such relations. However, we must also admit that the gradual liberalization of sexual relations has become an almost irresistible trend. Even if abortion is not legalized, people will still seek the advice of less qualified practitioners in spite of the law. The dangers to life as well as the miseries involved in such a situation can well be imagined.

Moreover, what we are doing now is tantamount to insisting that the entirely innocent baby must see the light of day in order to prove the guiltiness of its parents. But we tend to forget that when the illegitimate child is born, it is not the guilty parents who suffer any compunction of conscience, but rather the child who is

discriminated against by society. What right do we have, it may be asked, to let an innocent child fall victim to our own prudery?

Furthermore, it has been demonstrated again and again that however strict the laws against abortion may be, they can never kill people's interest in luring a member of the opposite sex to have illegitimate relations with them. Prewar France was noted for the stringency of its laws against abortion, but that did not prevent the French people from having romantic relations between the two sexes.

The last argument of our opponents is perhaps the most difficult to refute. They would say that abortion and birth control are inconsistent with our traditional love for a big family surrounded by as many children as possible.

All of us are heirs to the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e all love to have a large family, especially if the relations between parents and children are loving and intimate. When we have filial sons and daughters, it is an invitation for us to have more of the same kind.

It is precisely because of this that in advocating the limitation of population by birth control we are assailed by contradictory sentiments. On the one hand, there are the traditional ideas which have given us solace and comfort for thousands of years. On the other hand, there are the cold realities of population pressure which we must face with all the courage we have. Under such a situation, we are forced to make a choice between the two. In the last analysis, we cannot but be persuaded by reason to look the unpleasant realities in the face and to accept birth control as an inevitable solution to our problem of

population pressure.

—From the Cheng Hsin Hsin Wen, April 20, 1959

THE MORE ARE BORN, THE MORE DIE

In the general clamor for planned parenthood, I am reminded of the following story.

Once upon a time, the son of an Indian woman died. She was so grief-stricken that she went about everywhere in search of some wonder drug that would restore him life. Finally, she was told by somebody to go to Shakyamuni (the Buddha) for help.

When she found Shakyamuni, he told her to go to any family which had not mourned the death of any child and beg for a handful of mustards, adding, "If you let your son eat these mustards, he will immediately revive."

The poor mother followed Shakyamuni's instructions and went from door to door to ask for mustards from some family which had not mourned the loss of any child. She found plenty of sympathy and mustards. But when she asked her hosts whether they had ever mourned the loss of children, the answers she received were always identical: "Alas! most of them have died and only a few are still living, Please do not remind us of our deep-seated sorrow."

She continued her search for several days but always received the same answer. In utter despair and being completely exhausted, she became convinced of the futility of her efforts and went back home to have her son buried.

It is generally known that early marriage and poverty are all too prevalent in India, where married couples do

not know how to control the number of their children with the result that the more are born, the more die prematurely. Such a situation might well have served as the background for the above-mentioned story.

We are sorry to say that this Indian story can be bodily transplanted to Taiwan and be equally true. For the situation on this island is very deplorable, indeed. It is astonishing that out of every 100 deaths here as many as 42 are infants under four years of age.

But according to a sampling survey of thousands of families in Taiwan, the death rate of infants under four in families with no more than three children is less than ten per cent of the total number of deaths for all infants under four. This latter fact shows that the fewer children there are in the family, the more care their parents will be able to give them. Consequently, the financial resources of the family can be mobilized to meet all necessary expenses and the death rate of children naturally falls. In such families, the children not only can live, but can also live well.

Viewed in this light, planned parenthood has a direct bearing on the well-being of the whole family. It influences not only the welfare of the children themselves, but also the stability of society at large. The campaign for planned parenthood deserves our warm support.

—From the *Cheng Hsin Hsin Wen*, April 21, 1959

GOVERNOR CHOW REPORTS TO THE PROVISIONAL PROVINCIAL ASSEMBLY

The Taiwan Provisional Provincial Assembly held its fifth meeting of the present session yesterday, when Governor Chow Chih-jou made an administrative report and submitted his budget for the next fiscal year from July 1, 1959 to June 30, 1960, balanced at NT\$3,585,698,334.

Governor Chow emphasized that the principal task of the Provincial Government in the next year should be the further development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through intensified efforts so that there might be still better results. He pointed out that it is only prosperity growing out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which can satisfy the expectations of our fellow citizens in this province for improvements in their livelihood, which can support the continued expansion of our armed forces, and which can assure us of victory in our eventual counterattack against the Communist-occupied mainland. Hence as far as Taiwan is concerned, the next fiscal year should be one for the further expansion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nd the promotion of greater prosperity.

Governor Chow told the members of the Assembly that in consequence of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the past the national income of the people of this province had increased from NT\$29,982,000,000 in 1957 to NT\$31,901,000,000 in 1958, and the average income per capita had increased from NT\$2,893 in 1957 to NT\$3,031 in 1958. These figures, said Governor Chow, could have been achieved only through the wisdom and technical ability and by means of the blood and sweat of everyone of us.

At the same time, Governor Chow also told his audience that the population pressure is seriously undoing many of our achievements in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The population of this province jumped from 9,690,250 in 1957 to 10,039,435 in 1958, which means that there was an addition of 349,185 people in one single year. This represented an annual rate of increase of more than 36 per 1,000. Beginning from this year, there will be every day almost one thousand more people to feed and clothe and to provide for medically as well as in many other respects. It is our duty immediately to satisfy all their needs.

In the view of Governor Chow, being confronted with such a serious population pressure, we have to redouble our efforts for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in order to achieve higher prosperity for the future. However, this does not mean that we can afford to ignore other aspects of the provincial administration. What we are called upon to do is to regard economic reconstruction as our central task and to coordinate it with our efforts in other directions so as to achieve simultaneous progress on all fronts.

—From the United Daily News, May 1, 1959

農委會研考專刊第一號

農復會工作演進原則之檢討

作者：蔣夢麟 著

地址：台北市南海路三十七號

印刷者：海天印刷廠有限公司

地址：台北市中華路一段一〇四號

電話：(〇二) 三三一三〇五六

中華民國七十九年二月印行

統 一 編 號

25072780112